

2/2025
总第115期

上海公证

Shanghai Notary

- 上海公证行业创设多元协同平台，为群众烦心事提供“最优解”
- 社会监护组织作为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实践观察和思考



主管 上海市司法局
主办 上海市公证协会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上海市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K)0598

要闻



5月12日，市委常委、临港新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金山主持召开临港新片区法律服务机构调研座谈会。临港公证处党支部书记、主任丁闻在座谈会上作交流发言。



5月12日，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卢正一行赴东方公证处开展专项调研。



5月16日，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卢正一行赴张江公证处开展专项调研。



5月29日，徐汇公证处成立上海首家“涉外财富传承公证服务中心”。市司法局公证工作管理处处长徐文生，徐汇区委依法治区办副主任、区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左静鸣为“涉外财富传承公证服务中心”揭牌。

5月22日，市公证协会与市法律科技协会共同举办“公证+”AI大模型创新应用成长计划启动会。



以规范筑基 用优质铸魂

上海公证行业深入开展“公证规范优质”活动

最近以来，上海公证行业全面开展“公证规范优质”行动，这既是对司法部统一部署要求的坚定落实，更是行业自我革新、拥抱时代的必然选择。我们在做优服务、拓展领域、优化监管与强化作风中，以“巩固、规范、优质”为三大支柱，勾勒出公证行业赋能法治上海建设的清晰图景。

做优服务，是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实际行动。我们将“减证便民”办到群众心坎上，持续拓展“最多跑一次”事项至 217 项，运用科技手段上线“一次都不跑”小程序预约预审功能，275 项法律关系简单的公证业务出具公证书期限缩至 5 或 10 个工作日以内。持续推出利企惠企机制，创新“四双一”机制，推出定制服务包，为法治化营商环境注入公证动能。部分公证机构从工作日全覆盖的“晚班车”服务、十项“马上公证”便民举措，到设置“办不成事”接待专岗、专员负责投申诉等机制，每一次服务升级，都是对群众期待的温暖回应。

拓展领域，是拥抱时代变革的主动作为。在涉外法治与法律科技的新赛道上，我们构建“个人、企业、全场景”的一站式服务体系。深耕遗嘱公证、意定监护等民生服务，为人民群众构建更周全的法律防护网，让公证服务在全生命周期中绽放光芒。运用区块链技术筑牢电子数据存证防线，为知识产权保护与行政执法提供可信支撑。创新“商事调解+公证赋强”模式，将公证职能嵌入纠纷化解全流程。

优化监管，是行业行稳致远的技术保障；强化作风，是队伍提质增效的精神内核。上海公证行业通过科技赋能持续强化监管，制定《党建引领上海公证行业高质量发展十项举措》，将政治建设与发展深度融合，推动队伍从“坐等上门”到“主动登门”的服务意识转变。常态化开展职业道德教育与警示教育，以专业素养为锚、以服务热忱为帆，在涉外法治建设中当好企业出海的“护航员”，在社会治理中成为矛盾化解的“最优解”。

站在法治上海建设的新起点，上海公证行业正以“公证规范优质”行动为契机，将规范作为立身之本，把优质当作发展之魂。我们深知，唯有以科技赋能服务创新，以监管筑牢公信力基石，以作风锤炼队伍内核，才能让公证法律服务更有温度、更具效率、更富质感，这既是对“平安上海”“法治上海”建设的承诺，更是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回应。让我们以今日之行动，铸就明日之品牌，在新时代法治征程中书写属于上海公证的华彩篇章。

（编辑部）

CONTENTS

主管：上海市司法局

主办：上海市公证协会

《上海公证》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卢正

名誉副主任：徐文生

主任：陈铭勋

副主任：沈南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 闻 马 嫵 雯 从红梅 朱海挺

刘 颖 孙洪斌 李逊敏 吴 刚

吴冬艳 沈 南 张 磊 张丽丽

张晓燕 陈铭勋 周 密 胡晓瑾

侯 晓 洪 恩 祝维君 秦保国

凌云峰 高剑虹 唐 戈 曹 凌

盛少伟 崔亚霞 潘 浩

主 编：沈 南

副 主 编：丁 闻

责任编辑：娄运昌 王凤梅 孙逸乐

高 萍

《上海公证》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胶州路699号12楼

邮编：200040

电话：021-62184408

传真：021-62185665

Email: notary_bar@163.com

发送对象：会员单位、会员

印刷单位：上海兴隆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数量：500本



扫一扫，获取电子版

卷首语

- 1 以规范筑基 用优质铸魂
上海公证行业深入开展“公证规范优质”活动
(编辑部)

专题报道

- 4 “公证+”AI大模型创新应用
成长计划启动会顺利举行
(上海市公证协会)
- 5 “我的监护我做主”
上海普陀发布村居参与意定监护软法指引
(余东明 黄浩栋)
- 8 区块链高效赋能遗嘱存证
数据互联打通全流程智慧办证
上海公证服务实现“一次都不跑”
(余东明 黄浩栋)
- 10 上海公证行业创设多元协同平台
为群众烦心事提供“最优解”
(余东明 张海燕 张晓颖)
- 13 一专窗一通道 一领域一团队
一企业一方案 一园区一清单
上海公证“四双一”服务机制惠企利企
(余东明 张海燕)

探索与思考

- 15 社会监护组织作为监护人
履行监护职责的实践观察和思考
(李运洪)
- 20 以法律之盾为爱筑巢，
为心智障碍者家庭规划未来
(丁闻)
- 26 继承公证中涉及养子女有关问题的探讨
(胡晓瑾)
- 29 打通商事纠纷调解的“最后一公里”
浅谈“赋强公证”在商事纠纷调解中的作用
(朱燕明)
- 33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的新动向
(何玉祺 杜忆妍)
- 38 “公证Pro”——论人工智能时代下
公证发展的新模式
(施燕红)

行业动态

- 42 行业动态
- 封二 要闻
- 封三 行业掠影

会员天地

- 封底 姹紫嫣红
(方旭华)



“公证+”AI大模型创新应用 成长计划启动会顺利举行

3月初举办的上海公证与AI大模型深度融合及创新应用研讨会在行业引起热烈反响。为进一步培养公证行业信息化人才，推动公证行业AI大模型创新应用，上海市公证协会与上海市法律科技协会于5月22日下午共同举办“公证+”AI大模型创新应用成长计划启动会。市司法局公证工作管理处一级调研员陈继军参加启动会。

启动会上，阿里云飞天实验室高级产品架构师姚旭平、从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应用设计师王月冰分别分享了AI通用大模型及法律垂直领域大模型发展及应用情况；从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龙骄、科大讯飞法律科技创新业务部市场总监成家其介绍了自身搭建的交流学习培训平台的情况。

随后，公证员代表分享了AI大模型创新应用前景与设想。浦东公证处公证员、AI大模型创新应用团队成员俞弢介绍了浦东公证处已组建团队，以遗产继承公证咨询为切入点，打造AI公证大模型初级版本，实现AI赋能该领域咨询服务落地，提升智能

化水平；东方公证处家事部部长、线上服务团队负责人孙晓冬认为在线咨询作为公证服务的前端环节意义重大，AI系统的智能筛选分析可深度挖掘咨询数据，为优化服务和行业发展提供支持。

本次活动还揭晓了上海公证行业AI大模型创新应用团队遴选结果，并为团队成员颁发证书。

上海市公证协会会长陈铭勋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本次活动不仅在技术讨论的范畴进行了交流分享，更代表着公证行业与数字时代的对话和碰撞，让上海公证行业和法律科技行业在三个维度上进一步凝聚了共识。一是深化初心使命，以“人本科技”驱动服务升级，要明确行业双重定位，将“人的需求”作为技术应用的出发点。二是把握技术机遇，以“创新融合”提升服务质效，要以更开放的胸襟拥抱变革，将技术赋能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知的公共法律服务产品。三是强化责任担当，以“底线思维”规范技术应用，要主动承担责任，在技术应用中审慎考量，在行业标准上主动引领，对技术边界清醒认知。

（上海市公证协会）

“我的监护我做主”

上海普陀发布村居参与意定监护软法指引

◎ 法治日报记者 余东明 《法制与新闻》记者 黄浩栋

“最近来咨询意定监护公证的人格外多。”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辰阳透露。去年12月，上海市普陀区委依法治区办正式发布了由普陀公证处会同长寿路街道共同编写的《普陀区居（村）委参与意定监护事务软法指引》（以下简称《软法指引》），不仅让公证和社区共同为可能陷入失能、失智困境的人们筑起一道温暖且坚实的守护墙，也让意定监护再一次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关注。

“当前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如何做好对老年人和失能、失智人员的生活保障将成为社会治理中的一道‘必答题’。”上海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董海峰说，“《软法指引》能够更好回应人民群众意定监护需求，帮助他们及时获得相关信息并得到专业支持，更好地规划未来‘失能’后的代理、‘失智’后的监护事宜，实现‘我的监护我做主’，为解决基层治理的难点、堵点问题提供‘最优解’。”

回应群众关切

“我想有一个堂堂正正的监护人。”这是龚老伯发自内心的呐喊。

去年在上海热播的纪录片《前浪》讲述了这位

年逾九旬的独居老人坚持不懈通过意定监护公证寻求监护人的故事。

随着上海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像“龚老伯”这样希望通过意定监护找到余生依靠的人群。

“意定监护”是指成年人在自己清醒时选择一个自己最信任的人或者组织作为自己失能、失智后的监护人。《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上海是我国最早开展意定监护探索的城市之一，早在《民法典》颁布之前，上海就在地方条例中规定，以协商方式确定监护人需要通过公证等方式予以明确。上海市公证协会也发布了办理涉意定监护类公证的指导意见，为意定监护公证的开展提供顶层设计。

“尽管有《民法典》和地方条例、指导意见的支持，但详细的工作指引仍为空白，导致公证员避险能力难以提升；而作为意定监护重要组成部分的居村委，也存在‘监护人’与‘监督者’角色模糊的问题，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意定监护需



普陀公证处接待意定监护公证咨询。

求。”普陀公证处主任高剑虹告诉记者，“无论是公证行业还是基层社区，都亟需一份可操作性强的指引性文件。”

面对基层的呼声，上海先行先试，在普陀区开展意定监护工作操作指引制定的探索。普陀公证处和长寿路街道经过两个多月的调研、座谈、听证与征求意见，最终形成了这部《软法指引》。

记者了解到，《软法指引》目前涵盖了为自己确定监护人和为子女指定监护人的适用情形和操作步骤，以及业务流程图、协议参考格式和公证申办提示、所需材料清单、常见典型问题解答等具体内容。

协同推进落实

近日，普陀区某街道居委会收到了一封来自普陀公证处的公函，内容关乎独居老人王阿姨申办意定监护公证，希望居委做好后续监督工作。

“她有五个子女，但彼此感情淡薄，子女对母亲关心很少。我们建议她去公证处办理意定监护公证，为自己找一个信得过的监护人。”居委负责人告诉记者。

随后，居委向公证处发去回复，表示将有效监督监护人的职责履行，妥善保障王阿姨的养老生活，同时也将做好老人和子女之间矛盾纠纷的预防工作。

“《软法指引》的亮点之一就是明确了居村委在意定监护中更多起到事前排摸和事后监督的作用，并构建了公证处与居村委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有效解决了居村委角色模糊以及公证处办证风险难以预知的问题。”高剑虹说。

记者看到，《软法指引》中指出，居村委要主动排摸社情民意，引导符合条件者办理意定监护公证的具体流程，以及通过定期走访、指令监护人填写监护报告等形式监督监护履行情况。

此外，公证处在办理意定监护公证过程中，也

可通过居村委进行家庭情况核查，避免办证过程中产生风险。当事人在公证处办理意定监护公证后，公证处应向所在居村委发送公函，告知办理结果，提醒其履行监督职责。

普陀区委依法治区办表示，在《软法指引》指导下，居村委得以将有限的基层治理资源从繁杂的监护事务中解放，通过引导居民办理意定监护公证和监督监护人履职，更好地解决监护难题；公证处也能借助居村委贴近当事人的优势了解到其真实的家庭情况，两者形成互相协同的工作模式，更有助于提升意定监护公证的服务效能。

“监护事务是居村委承担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基本内容之一。居村委主动参与意定监护，有利于更好保护居民合法权益，也有助于减少家庭纠纷，为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奠定基础。”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王远华说。

构筑全新生态

2月21日，普陀区司法局举办了《普陀区居(村)委参与意定监护事务软法指引》专题培训活动，组织普陀公证处意定监护领域的资深公证员深入社区开展居村委干部培训，进一步提升基层意定监护工作的专业能力。

“意定监护是法定监护、协议监护等制度的重要补充，《软法指引》的宣传过程也是集思广益的过程，我们将不断完善和优化相关内容，使其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优秀经验。”普陀区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张韶春说。

据悉，目前在上海市司法局指导下，上海市公证协会正在全面评估《软法指引》的实施效果，通过吸收其中的优秀做法和成功经验，着手修订全市办理涉意定监护类公证的指导意见，同时，普陀公证处已成立公证员宣讲团，面向全市有需要的居村委开展意定监护事务培训活动，不断增强《软法指引》的影响力和执行效能。

此外，上海也在积极探索将法院、检察院、妇联、社保、养老组织、社会机构等力量进行整合，形成有法律支持、社会共同参与的良性发展生态，推动意定监护进一步标准化、规范化运行。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上海公证行业持续开展的涉老公证服务和创新实践，涌现出一大批服务品牌和创新项目，为更好地推动涉老意定监护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比如徐汇公证处结合“时光延展师”家事品牌，在遗嘱、意定监护、生前信托等为老公证服务上积极探索，与区法院、民政局签署协议，首次系统参与到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立体制度中，公证处开通“徐汇公证嘚啵嘚”视频直播，邀请纪录片《前浪》导演共同探讨养老问题以及为老公证服务等。其余公证机构也正通过拓展遗嘱公证、生前预嘱、资金监管、扶养公证等为老服务项目，打好意定监护公证服务的“组合拳”。

“意定监护满足了当下和未来人民群众对于养老、就医、人文关怀的迫切需求。下一步，上海市公证协会将积极倡导公证机构努力创新、积极作为，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谋求合作，共同打造意定监护服务民生的全新生态。”上海市公证协会会长陈铭勋说。

区块链高效赋能遗嘱存证 数据互联打通全流程智慧办证

上海公证服务实现“一次都不跑”

◎ 法治日报记者 余东明 《法制与新闻》记者 黄浩栋

“这么快就拿到了公证书，这样的速度让我惊喜。”不久前，在上海工作的韩国人安女士要到国外工作，需要提供自己在中国期间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公证认证，致电后得知只要在“长宁公证在线申办”微信小程序上提交申请即可，并很快拿到了公证书。

《法治日报》记者在后台看到，公证员依托“智慧公证”办证系统视频连线安女士后，便办理了公证手续。

坚持科技赋能、打通数据壁垒、推动线上办理、优化服务供给……近年来，上海公证行业切实将“公证为民、减证便民”和“一次都不跑”的服务理念落到实处。

“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迅猛发展，为司法行政系统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上海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董海峰说，上海公证行业借助科技与法律深度融合的东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推进行业重塑，以日新月异的新变化和新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满意度，为上海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持续赋能。

拓展全新领域

随着老龄化和社会观念的改变，广大市民逐渐从避讳遗嘱向理解遗嘱、订立遗嘱转变，与遗嘱相关的公证业务数量也快速增长。市北公证处探索引入区块链与智能合约应用，推出了“建证区块链遗嘱存证服

务平台”。该平台使老年居民可以更加便捷地对自己的生前遗嘱、遗言等进行摄录或上传并上链保存。区块链遗嘱存证服务不仅是公证服务与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也是法律科技在遗嘱公证领域的全新应用。

“建证区块链遗嘱服务平台不仅简化了遗嘱存证的繁琐流程，减轻了中老年人的负担，更为公证处提升服务效能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从遗嘱的自主设立到遗产继承的顺利处置，我们实现了‘一链式’闭环管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真正实现为群众办实事的社会价值。”上海市公证协会副会长、市北公证处主任凌云峰说。

截至目前，区块链、数据云等新科技在上海公证行业已普遍应用，同时还在多个新兴领域开展研究创新，构建了迭代清晰、高效实用的法律科技应用体系，一系列全新服务项目如雨后春笋。

东方公证处全新打造了“线上存证、电子数据指纹、在线抽奖、远程视频”四大法律科技服务平台；徐汇公证处专门为大型游戏公司、园区科创公司等重点企业打造知识产权及商业秘密保护平台，又名“汇保全”；松江公证处为城管“非现场”执法量身定制数据实时上链存证平台；张江公证处创新推出新能源汽车电子数据存证服务；卢湾公证处开辟“信证链”线上协查通道，突破传统发函协查局限……

“法律科技的发展应用改变了传统公证服务的表达方式，也全面更新了老百姓的服务体验，将公证行

业守护公平正义的信心和决心传达给每一位老百姓，将安全和信任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上海’‘法治上海’贡献公证力量。”上海市公证协会副会长、徐汇公证处主任潘浩说。

打通数据壁垒

“全程网办!”这是虹口公证处最近推出的不动产继承经过公证即可“全程网办”产权变更登记。公证员通过上海“一网通办”平台进行申请，线上提交相关公证文书，“全程网办”系统将自动抓取相关身份信息和记录，同步协同开展核查和验证工作……

“自2023年底，公证处和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共同推动虹口区不动产法定继承公证‘一件事’项目在‘随申办虹口旗舰店’正式上线后，双方数据互联，实现线上文书递交，申请人足不出户就能完成身份核验与意愿表达，并办理所有登记手续。”虹口公证处负责人富晓燕说。

这项全新服务正是上海公证行业积极落实“一网通办”，推动数据互联互通，提高公证网办服务水平的缩影。

“要实现公证服务的安全快捷，就必须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字的互联互通，全方位保证‘一次都不跑’服务承诺。”上海市公证协会副会长、浦东公证处主任曹凌说。

为此，上海公证行业创设了“办件码”，实现了智慧公证一体化办证平台与“一网通办”平台的全链条、全周期、全领域对接，被老百姓誉为“小小‘办件码’服务‘大引擎’”。

在此基础上，上海公证行业持续优化智慧公证办证平台，积极落实“一次都不跑”小程序在线预约、预审、咨询服务，实现电子亮证服务，提高数据复用，通过与城市政务服务平台整合，将公证服务接入“随

申办”三端平台，优化服务流程，提升办证效率，全面提高公证事项网办率、全程网办率及数据质量，为市民群众提供更便捷的在线公证服务。

探索发展空间

长宁公证处积极参与海外人才“一站式”服务，实现公证认证全程联办。在提供线上咨询、线上受理、代办认证、快递送证等服务的基础上，将“公证+互联网”“公证+区块链”“一网通办”等新型公证模式推广到海外人才服务，打造科技赋能公证提质增效新高地。

“数字化革命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迭代升级。公证行业只有勇于探索、敢于应用，才能为行业发展带来全新空间和无穷潜力，才能创造出更多应用新成果和服务新品牌。”上海市公证协会副会长、长宁公证处主任李逊敏说。

记者在浦东新区了解到，之前公布的《浦东新区促进法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明确指出，支持公证机构开展运营机制改革与探索，扩展更多公证事项实现“跨省通办”；支持公证机构通过网络视频通话、生物识别、证件核验、电子签名等方式，开展海外远程公证事项和事务的办理；鼓励公证机构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新型领域拓展业务，参与区块链存证等新兴公证领域的行业标准制定。

“科技赋能为公证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翅膀’，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上海公证行业将通过长远布局，向更深层次的应用发力，努力推出更多便民利企的创新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为公证行业输出更多优秀的‘上海样本’和‘上海模式’。”上海市公证协会会长陈铭勋说。

据了解，上海市公证协会近日在部署全年工作时，在多年持续发力的基础上，依然把加快“法律科技”应用作为重点项目。

上海公证行业创设多元协同平台 为群众烦心事提供“最优解”

◎ 法治日报记者 余东明 张海燕 实习生 张晓颖

“您遗产继承的问题通过公证就能解决，不用打官司。”

“这份赋强调解公证书可以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公证参与调解，专业靠谱又省心。”

……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访上海各公证处，欣喜地发现公证员在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方面大显身手，为广大老百姓提供了更多更便捷的“最优解”方案。这背后离不开上海公证行业近年来与法院、商事调解组织、人民调解行业联合创设的多元协同平台。

“从预防潜在法律风险，到解决现实法律纠纷，上海公证行业不断拓展公证参与调解的服务范围，全方位、多层次、高品质助力‘平安上海’‘法治上海’建设。”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董海峰表示，多元协同平台的创设，使得公证调解力量得到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并以更便捷、更划算、对抗性更小的方式为人民群众了却烦心事，充分彰显公证机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独特优势。

入驻人民法院

走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公证办理”窗口赫然在目，其中有一家人正在咨询房产继承问题。

“你们都有遗产继承权，也没有大矛盾，为了孩子

能尽快入学办理继承房产过户，可以不用打官司，通过公证就能迅速办理好。”公证员弄清了他们的意图后，给出了可行性方案。

“公证文书是司法认可的‘强证明’，有些纠纷在诉讼服务中心经过公证员努力调解后，当事人已没有太大分歧，能够通过公证快速解决，节约了相应的司法资源与成本。”上海市公证协会副会长、松江公证处主任沈南说，“与法院合作开设公证专窗，为已缓和矛盾的当事人及时主动提供更加便捷有效的法律服务，也为法院缓解了‘案多人少’的压力。”

据了解，早在2017年，上海公证行业便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不少公证机构先后与



2025年4月14日，群众在松江法院公证办理专窗咨询公证业务。

法院建立协同平台。在诉前，对双方无争议，但相关管理部门需要相关法律文书才能办理的事项，如法定继承过户房屋、机动车权利人变更等，当事人可以优先通过公证解决，从源头上分流案件。

在诉中，公证机构发挥公证提存和资金监管功能，缓解当事人对涉诉资产保全的顾虑，促进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同时还在文书送达、调查取证、参与执行等环节提供公证服务，有效减轻法院压力，节约司法资源。

“公证作为预防性司法证明制度，是社会纠纷多元化解决的基础性资源。我们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实现公证与审判执行的高效衔接，发挥公证在提高司法效率、推动司法改革、维护司法公信力中的专业优势。”沈南说。

携手商调机构

凭借宝山公证处出具的一纸执行证书，陈先生成功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打官司就是为了判决结果履行到位，现在凭借‘赋强公证’也能达到这个目的，而且效率高、成本低。”陈先生说。

此前，陈先生与公司发生股权转让纠纷，上海宝山区旋天调解事务所携手宝山公证处为其主持了调解，促成双方达成协议，并办理了赋强公证书，纠纷得以圆满化解。

“打官司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彼此的合作与信任，‘商事调解+公证’的协同联动，不仅可以高效解决问题，还更有利于维护交易各方的友好关系，避免‘涉诉信息’对企业征信的影响。”宝山公证处负责人张晓燕说。

据了解，去年5月，上海市司法局会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商务委员会、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



2024年6月11日，宝山公证处与宝山泛亚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共同召开“商事调解+赋强公证”座谈会。



2024年8月30日，虹口公证处联合虹口北外滩多元商事调解中心，协同解决商事纠纷，并办理赋强公证。

局、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市工商业联合会印发《关于促进本市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创新性提出试点“商事调解+公证”的赋强计划，鼓励支持商事调解组织与公证机构搭建协同平台。

目前，这一机制已广泛推行。在商事调解前，公证处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风险评估等服务。在调解过程中，公证员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审查，确保协议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当事人成功达成调解协议后，可申请公证处为调解协议办理赋强公证，即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如发生履行争议，公证处对违约情况进行核实后出具执行证书，债权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去年初，虹口公证处与上海市虹口北外滩多元商

事调解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建立优化协同高效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畅通案件的引流渠道，提供公证、调解、固化证据等全方位解纷辅助服务。

“我们正积极携手商调组织，协同解决商业纠纷，维护市场秩序，共同打造高效、便捷、融通的综合法律服务生态圈，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虹口公证处负责人富晓燕说。

跨界多元调解

经过数月筹备，上海市浦东新区公谐调解中心近日完成了50名调解员的选聘工作，这家由张江公证处发起设立的社会组织将全面开启调解业务。

“公证机构跨界融合多元调解，让广大调解员兼任公证联络员、公证员兼任调解员，搭建公证与调解的全方位协作和资源共享平台，可进一步提高解纷效率，降低解纷成本。”上海市公证协会副会长、张江公证处主任张磊说。

像这样的跨融调解组织在上海并非少数。此前，新虹桥公证处和上海翰海法律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上海闵行区星虹桥金融商事调解中心，会聚公证员、律师等50余位专业人士，利用区块链电子签约、线上视频调解及外呼电话录音系统，已线上线下协同受理案件百余件，涉及标的总额达1000余万元，其中调解成功68件。

如今，上海越来越多的公证处正积极参与多元解纷工作，综合运用提存、资金监管、保全证据、履行监督、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等方式强化和巩固阶段性调解结果，并通过在线调解平台、微信小程序等工具，实现文书流转、证据保全、协议公证的数字化协同，提升效率并降低时间成本，帮助终局性调解成果快速实现。

全市公证员队伍也在不断适应新的工作方式和要求，充分发挥公证机构与其他民商事调解机构之间的协同作用，为当事人提供纠纷化解“最优解”方案，持续提升公证参与调解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充分激发公证行业的调解潜能，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举措，也是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体现。”上海市公证协会会长陈铭勋表示，下一步，上海公证行业将持续探索和创新，对外加强协作联动，对内提升法治化、专业化、职业化能力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公证服务的新期待、新要求。



2024年10月29日，张江公证处驻浦东法院公证调解专窗收到当事人赠送的锦旗。



2024年12月12日，上海市闵行区星虹桥金融商事调解中心召开调解员业务培训会。

一专窗一通道 一领域一团队 一企业一方案 一园区一清单 上海公证“四双一” 服务机制惠企利企

◎ 法治日报记者 余东明 张海燕

2024年，国产首款3A游戏《黑神话：悟空》全球上线即引爆市场，长宁公证处为其量身定制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案也火出了圈。

企业和公证机构实现双赢，正是得益于上海公证行业近年来创新推进的“四双一”服务机制。据介绍，2023年以来，上海市司法局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创新推出“一专窗一通道、一领域一团队、一企业一方案、一园区一清单”公证惠企利企服务机制，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赋能。

上海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董海峰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两年来，上海公证行业坚决落实《上海市聚焦提升企业感受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变‘坐等上门’为‘主动出击’，从‘全面铺货’到‘专精服务’、由‘按部就班’到‘守正创新’，充分彰显公证服务的温度、速度和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拓展联络机制

“游戏开发过程中，平面设计、3D模型等数字资产更新极快，传统版权登记根本来不及保护。”长宁公证处公证员梁永捷介绍说，“长宁公证存证”可实时将任意电子数据上链存证并生成存证证书，同时存证服务也不受地域限制。

2023年，正值游戏科学公司为知识产权保护焦

头烂额之时，公司法律顾问向其推荐了长宁公证处。“我们到杭州深入了解了企业的需求和顾虑后，向其推荐了‘哈希值存证模式’，这种全新的存证技术不需上传原始数据，而仅需存证文件特征值就可以，既有效保障了企业的商业秘密，又为事后可能发生的侵权诉讼留存铁证。”上海市公证协会副会长、长宁公证处主任李逊敏说。

李逊敏介绍说，“四双一”服务机制要求公证员“主动出击”，通过问需于企、问计于企、问效于企，打通公证融入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据悉，近两年来，上海各公证机构依托“四双一”服务机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纷纷驻点产业园区，聚焦新业态、新领域、新经济，拓展市场联络机制，提供精准的专属服务。

例如，松江公证处与上海车墩、仓城两大影视基地园区合作，由资深公证员担任公证法律顾问，一对一为园区内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公证法律咨询，设计专属的服务清单；张江公证处打造“张江科学城知识产权公证保护中心”，制定知识产权保护专项公证服务清单，为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有效法律支持。

截至目前，上海各公证机构落实“一园区一清单”，累计对接51个园区，与160家大型企业签约提供专属服务，能够精准感知企业需求，实现公证行业与市场主体的无缝衔接。

集成服务项目

境外投资需要提供资质证明、商务派遣需要员工无犯罪记录证明、知识产权保护需要权利合法性证明……上市公司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海投资，也遭遇诸多公证难题。

“新虹桥公证处在了解我们难处后，及时指派公证员与我们对接，定制了一揽子服务方案，不但有效防控了潜在法律风险，还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东富龙集团党委书记、副总裁唐惠兴说。各公证机构为企业出海当好“探路者”和“护航员”，进一步拓展了“四双一”服务机制的内涵和外延。

近年来，上海 25 家公证机构聚焦 4 个领域组建了 59 支专门服务团队，超预期实现了“一领域一团队”“一企业一方案”的工作目标。比如，东方公证处运用信息技术为可口可乐公司、麦当劳公司办理网络有奖活动公证，量身定制专门解决方案，提供公证法律咨询、公证抽奖系统技术支持、抽奖数据证据保全等全方位的公证法律服务；嘉定公证处搭建公证与区内重点企业、特色产业对接平台；奉贤公证处组建了由资深公证员组成的专业金融服务团队，为金融机构及相关企业提供包括洽谈、监督、介入调解等一条龙精准服务。

在此基础上，各公证机构还进一步推进品牌建设，在服务方式上一改传统公证较为碎片化的服务，取而代之的是“定制+复合”的集成式服务。

去年，上海公证行业推出了首批公证特色服务项目，包括东方、徐汇、长宁、新黄浦、新虹桥公证处共同推出的知产公证“慧保全”品牌，将公证服务拓展到知识产权的咨询、评估、调解、维权等领域。还有临港公证处的“药企直通车”、新虹桥公证处的“民企出海帆”、宝山公证处的“‘携’商化解 公证赋能”、

松江公证处的“存之有据 提之有利”等涉企特色服务项目。

“‘四双一’机制鼓励公证机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集中专业力量为经营主体提供专业化、国际化、高能级的综合法律服务，提升市场竞争力，打破制约公证行业发展的瓶颈和堵点。”上海市公证协会监事长、新虹桥公证处主任徐雪梅说。

提升办证质效

记者打开宝山公证处为企业服务微信小程序“e 专窗”，发现里面不仅有留言咨询、预约办理等功能，而且在提交公证申请后，公证人员的回复很快就发过来了。

“为了配齐‘一专窗一通道’，我们在提供线下专窗服务的同时，还配套研发了线上‘e 专窗’，线上线下同时为老百姓提供‘一对一’公证服务，实现咨询、预约、办证无缝衔接。”宝山公证处负责人张晓燕说。

如今，上海 25 家公证机构均已实现“一专窗一通道”，为企业提供快办特办服务，并依托法律科技赋能，进一步压缩办证时限。依照《上海市公证办理提速清单（2024 年版）》，275 项简单公证事项办结时限压减至 5 或 10 个工作日，部分事项已从“按周计”到“当日结”，实现“最多跑一次”或“一次都不跑”。

“新时代新征程，上海公证行业要时刻保持对市场的渴望和尊重，坚持守正创新，推动‘四双一’服务机制提档升级，持续扩大品牌社会影响力，打造充满活力的行业发展新生态，为推动上海高质量发展、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贡献公证力量。”上海市公证协会会长陈铭勋说。

社会监护组织作为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实践观察和思考

◎ 李运洪

《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设定了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弥补了法定监护的不足，扩大了监护人范围，充分尊重成年人的自我决定权。但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无子少子化进程的加剧，部分有意定监护需求的委托人无法找到满意的自然人作为监护人。社会监护组织作为家庭监护的有益补充，可以有效缓解因家庭成员因工作、生活等原因无法充分履行监护职责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子女不在身边的独居老人，社会监护组织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照顾。

以目前上海意定监护公证的实践来说，意定监护绝大多数都是委托自然人担任监护人。但是随着专门从事监护服务的组织成立，委托人多了一个选择，可以在找不到适格自然人作监护人的情况下，委托社会监护组织作为监护人。如上海市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经民政部门批准成立，是国内第一家专业从事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从事社区社会监护的推广与赋能以及担任委托人监护人个案服务。本文试对上海社会监护实践进行分析，研究解决社会组织担任监护人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监护组织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

根据《民法典》第三十三条，意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愿意担任监护人的近亲属、个人、组织签订《意定监护协议》，

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约定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意定监护和法定监护的最大区别是允许成年人自主选择自己未来的监护人，而不是按照法律规定的顺位确定自己的监护人。近亲属、个人、组织均可担任监护人，这为专门从事监护的社会组织担任监护人提供了法律入口。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至2023年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2.9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1.1%，而空巢老人占比已超过一半。有研究显示，到2030年，空巢老人将达到两亿人。而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和北京市老龄协会公布的《老年人监护问题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事实无人监护、处于监护困境的老年人数量明显上升。在1611名被调查者中，长期空巢老年人约占40%，无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共约占40%，老残一体家庭约占13.7%，有子女但不愿意监护的老年人约有8.35%。有近80%的老年人担心，出现突发疾病或遇到意外情况时无人料理紧急医疗救治、身后事等相关事务。¹

随着民法典意定监护制度落地，在监护的现实需求刺激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下，专门提供社会监护的组织顺势而生。但当前社会监护服务面临社会认知度不足、服务模式和标准有待完善、社会监护服务团队紧缺、社会监护组织的公信力不

1. 李敏：《医疗决定权与成年监护制度的衔接——医疗代诺权的制度建构》，《人权》，2023年第3期。

强等问题。作为全国率先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特大城市，上海市在老年人权益保障以及养老服务体系构建上不断推陈出新，司法部门特别是公证行业对于意定监护公证不断探索，政府部门对于兜底监护模式不断完善，社会组织作为监护主体参与服务不断创新，显示出上海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的决心与信心。

二、社会监护组织参与监护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从上海社会监护组织实践看，社会监护组织作为监护人行使监护职责的主要途径有三类：一是签署意定监护协议，由未来被监护人在神志清楚时与社会监护组织进行协商，确定其在自己未来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作自己的监护人；二是委托监护，通过被监护人的法定监护人授权获得监护权；三是指定监护，法院直接指定社会组织作为监护人，或者居委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社会组织作为监护人。现阶段，第一类意定监护的案例占据绝大多数。

（一）委托人通过意定监护协议选择社会组织担任监护人

此类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委托人没有法定监护人，也找不到法定监护人之外的自然人作监护人，只能寻找社会监护组织担任监护人；二是委托人有法定监护人但不愿意或者无法担任监护人，或委托人不愿意选择法定监护人作为监护人，最后选择社会组织担任监护人。

从委托人主观意愿看，主动选择社会监护组织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委托人认为社会监护组织更

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能更好履行监护职责；二是委托人有信任的亲朋好友愿意担任监护人，但是不想给亲朋好友增添负担，主动选择社会监护组织担任监护人；三是委托人和其法定监护人一致同意指定监护组织担任监护人，常见于委托人的法定监护人在国外无法或不便担任监护人。被动选择社会组织作为监护人的缘由基本一致，即委托人无法找到合适的监护人，也无自然人愿意担任委托人的监护人。

在公证实践中，委托人通过意定监护方式与社会监护组织建立监护关系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委托人把社会监护组织作为唯一意定监护人；二是意定监护人同时指定自然人和社会监护组织作为共同意定监护人；三是委托人指定自然人作为第一顺位意定监护人，监护组织作为第二顺位监护人。

（二）社会监护组织经法定（意定）监护人授权担任监护人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条规定了委托监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监护人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的，监护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受托人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责任。委托人因为特定原因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可以选择信任的自然人或者组织作为监护人，被委托人行使监护职责，对被监护人进行监督和保护，实践当中有三种情形。

第一，法定监护人委托社会监护组织担任监护人，通常发生在既定监护人因特殊原因无法或不便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下。笔者办理过一个案例，被监护人的舅舅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成为被监护人的监护人，后舅舅因生病卧床不起，委托社会监护组

织作为监护人。

第二，意定监护人委托社会监护组织担任监护人。意定监护人是否可以委托社会组织担任监护人取决于监护和意定代理协议。如果该协议约定意定监护人不能转委托他人作为监护人，那么意定监护人不能随意转委托；如果没有进入监护阶段可以重新修改合同；已进入监护阶段，而意定监护人确实无法行使监护职责的，可以进行监护的放弃，但放弃之前要进行临时监护，可以寻找被监护人的其他法定监护人或者公职监护接任。在上海公证实践中，如果监护启动后，意定监护人确实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意定监护人的配偶和子女等家庭成员可以作为临时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当然临时监护一般仅限于医疗紧急救治等情形。

第三，公职监护人委托社会监护组织担任监护人。《民法典》第三十二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该条款规定的是公职监护人，实践中民政部门直接被指定作为监护人的情况较少，一般是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被指定为监护人；居委会、村委会作为监护人，因不便亲自履行监护职责，可以委托社会监护组织作为监护人。家住上海市南京东路街道的孤老陈老伯77岁，未婚，无子女，曾因精神问题被家人送往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后来家人去世，无监护人。因其原住所在征收地块范围内，其拆迁补偿款暂由居委会保管。居委会委托律师事务所向黄浦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判决宣告陈老伯无民事行为能力，指定该居委会作为陈老伯的监护人，并引入第三方制定

监护方案、履行监护事务、定期向区民政局和街道汇报履职情况并接受指导监督。在该案中，居委会是陈老伯的监护人，但在具体执行监护事务时可以委托第三方社会监护组织履行监护职责。随着公职监护的推进，民政部门、村居委作为监护人的案例会越来越多，民政部门和村委会、居委会不是职业监护人，可以将相应监护事务委托第三方社会监护组织实施。

（三）通过遗嘱指定社会监护组织担任监护人

《民法典》第二十九条规定，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依据本条款规定，被监护人（包括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父母可以通过立遗嘱的形式为被监护人指定监护人，但前提是被监护人的父母正在担任着监护人，如果父母因丧失监护能力没有担任监护人，或者因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被撤销监护人资格而不再担任监护人的，父母不宜再通过立遗嘱的形式为被监护人指定监护人。

父母通过遗嘱指定社会监护组织担任监护人，此情形一般见于心智障碍家庭。心智障碍成年人未来可能是未婚无子女的状态，在解决其未来托付的时候，其父母为其指定监护人是非常有必要的。

公证实践中也有监护人是被监护人的兄弟姐妹而非父母子女关系。被监护人和监护人的父母已死亡，被监护人未婚无子女，监护人担心自己去世后，被监护人生活无人照料，这时作为被监护人兄弟姐妹的监护人能否通过遗嘱指定信任的人或者组织担任监护人，实践中存在争议。同样，配偶一方能否通过遗嘱方式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的另一方指定监护人也需要立法进一步明确。

（四）法院直接通过判决指定社会组织担任监护人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在一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案件中作出判决，指定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担任一位精神障碍老人的监护人。在该案中，陆女士年近七十，父母、丈夫均已身故，儿子 2004 年患精神分裂症长期住院。陆女士兄弟姐妹长久失联，虽经有关部门联络，但均不愿意担任陆女士监护人。陆女士户口属于闵行区“社区公共户”，并无对应的管辖居委会，法院最终直接指定监护组织作为被监护人的监护人。虽该案具有一定争议，但是确实为解决监护难问题提供了司法路径。

三、社会监护组织担任监护人的观察和思考

知晓度问题。社会监护组织出现尚不足五年，不被公众所熟知，从当前实践来看多数是委托人的无奈之举。同时，公众对监护组织缺乏信任，且建立信任需要一定时间的宣传，更需要过硬的服务品质。

费用问题。相比于近亲属、朋友、专业人士以及政府的兜底监护，社会监护组织是需要收取费用的。一般而言，委托人神志尚清楚的阶段，按照代理进行收费；进入到监护阶段后，按照监护进行收费。如果没有稳定收入，要承担社会监护组织的代理和监护费用有一定难度。

监督机制缺失问题。以上海意定监护公证的实践数据进行分析，只有不到 30% 的委托人会选择

意定监督人，对监护人履职进行监督。我国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意定监护须设定监督人，委托人一般选择不设定监督人，有的是确实找不到监督人，更多是认为选择监督人即对未来监护人不信任，担心适得其反，影响和未来监护人的信任关系。在公证过程中，公证人员会反复劝说委托人选择监督人，对于没有选择监督人的，一般会增加兜底监督，要求监督人向公证处提交监护报告，以免发生监护人侵犯被监护人权利的事件。当然，公证机构能否担任监督人尚存争议。

社会监护组织担任监护人也面临监护监督制度缺失问题。任何权利都需要监督，缺乏监督会导致被监护人人身和财产无法得到有效保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监护监督的引入不仅是被监护人的现实需求，也是社会监护组织增加自身透明、防止监护纠纷的应有之义。

履职缺乏法定标准问题。监护组织作为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一般包括照护、财产管理、医疗决策、权益保护、死后事务等方面。医疗决策的监护职责标准是什么，是否可以签署放弃治疗，财产管理的履责标准是什么，是否要保值增值，财产适用如何汇报，向谁汇报，权益保护的监护履职要做到什么程度，履行监护职责的标准和法定监护人相比是否存在差异，有偿与无偿提供监护服务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有待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和司法裁判中的指引。

此处举一案例。2024 年 3 月 25 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姐弟俩争夺九旬老父监护权的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进行宣判，并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成年监护指示》《被监护人人身及财产

情况一览表》《监护台账》。这个纠纷的本质就是监护人如何履行监护职责的问题。嘉定区人民法院将案件重点放在如何完善监护履职过程上来，通过前述送达的表格台账，对监护人如何规范监护履职提供了规范。如其中《被监护人人身及财产情况一览表》，监护人应当记录被监护人对自己事务的真实意愿（居住环境、财产管理）、身体情况、护理依赖程度、娱乐及社交情感需求、宗教信仰等内容。尽量以生活化视角固定被监护人的基本情况，敦促监护人尊重和保持被监护人的生活习惯及人格利益。再如以白清单方式告知监护人留存证据、查明被监护人意愿的步骤、被监护人意愿先后不一如何应对、定期安排娱乐休闲社交活动、定期安排就医体检、财产可以提存第三方保管等；以黑清单方式告知不得变

更被监护人居住环境及例外情况、不得违规使用药物、不得处分财产的多种情形、不得拒绝接受纯获利益的行为等。尽管是法院在个案当中给出的监护人如何履行监护的司法指引，但对于社会监护组织如何履行监护职责提供了参考标准。笔者认为，这些应为从事相关工作的部门包括公证行业所关注和学习，为督促监护人更好履职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监护责任承担不明确问题。监护组织承担的监护责任和自然人监护人承担的责任是否不同，未成年监护和成年人监护监护人承担监护职责是否要进行区分，意定监护人和法定监护人共存时监护责任如何确定，有待明确。

（本文作者系徐汇公证处公证员）



徐汇公证处公证员李运洪为当事人办理意定监护公证

以法律之盾为爱筑巢， 为心智障碍者家庭规划未来

◎ 丁闻

根据相关统计估算，我国心智障碍者数量约为1200万至2000万，他们身后牵涉到约8500万相关家庭成员。这些家庭在抚养心智障碍儿童时，面临严峻的“老养残”照护挑战。当他们的父母步入老年、身体状况转弱，甚至遭遇失能或认知障碍时，不禁自问：我的孩子该怎么办？未来谁又将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财产应如何妥善安排和管理，以确保子女的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避免财产被不当使用或侵占？鉴于此背景，公证机构作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有责任主动肩负起通过公证服务模式为这些特殊心智障碍人群家庭构建法律保障的职责。笔者将围绕如何发挥公证职能介入智残群体特殊家庭监护需求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服务，并结合实际案例设计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回应这些家庭最为关切的问题。

一、心智障碍者家庭的困境

基于笔者的走访调查及所接触的真实案例，本文以下述典型案例作为讨论的基础模型：A女士有一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且A女士的父母及配偶均已离世，此外，A女士拥有一套不动产和数十万元的存款。她忧虑自己一旦健康出状况或不幸离世，孩子无法得到妥善照顾。

我们分析A女士的担忧，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首先，A女士担心自己丧失监护能力或去世后，孩子将无法得到适当的照料；其次，她不知道自己去世后，财产传承问题将如何解决；最后，她本人的晚年生活可能面临缺乏依靠的困境。

《民法典》通过遗嘱指定监护、遗产管理人制度、遗嘱信托等配套法律规范对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支持，弥补了原《继承法》相关制度的不足，满足了人民群众特别是我们所关注的心智障碍者家庭的需求。目前《民法典》实施已逾五年，然而根据笔者所在公证机构与上海市浦东新区辅读学校联合开展的社会调查问卷分析结果，有85.5%的特殊家庭经常思考特殊儿童未来的生活问题，却未制定具体计划，92.5%的家庭未曾接触过家事公证，更有71.5%的家庭对与他们密切相关的监护、信托等法律知识缺乏了解，甚至有24.2%的特殊儿童家庭缺乏合适的监护人选来应对孩子未来的监护问题。此外，问卷中也收到众多家长的留言，他们期望社会可以更加关注这些特殊人群，尤其是希望基层社会服务单位能够切实做好关怀特殊人群的工作。

我国的公证制度经过四十余年的演进，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作为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相适应、紧密联系国情、与时俱进的法律服务机构，公证队伍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笔者期望通过专业的公证活动，与《民法典》相关

制度规范实现充分的衔接，进一步协助这些家庭解决一直困扰在他们心头的心智障碍人群未来关于“人”“财”“所”的问题。

二、意定监护与遗嘱指定监护：心智障碍者家庭监护问题的制度保障与公证介入

在前述案例中，A女士及其患病的孩子将来均可能面临监护需求。A女士可在意识清醒、行为自主的状态下，前往公证处与自己充分信任的亲属、朋友办理意定监护协议公证，从而在监护协议中指定监护人；同时，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她亦可通过遗嘱为孩子指定监护人。

（一）遗嘱指定监护

根据《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以及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法定监护有明确的顺序。然而在现实情况中，对于有心智障碍者的家庭，如A女士家庭的设例，法定监护人可能因生老病死的种种原因无法继续照顾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心智障碍者的父母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可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民法典》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此规定体现了《民法典》修纂的亮点之一，即法律赋予了监护人自主决定指定监护人的权利，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民事权利。必须注意的是，适用该条款指定子女监护人时，必须通过遗嘱形式进行，并且在指定过程中父母应为当时的监护人。对于心智障碍者，特别是当心智障碍者为未成年人时，父母有权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指定监护人，若原先指定的监护

人因特定原因无法履行职责，父母可以再次立遗嘱更替监护人，或设置条件指定多名候选监护人，以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徐某甲申请指定监护人案是上海市首例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的案例¹。徐某乙和陈某是夫妻，育有一子陈某乙。陈某被鉴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徐某甲是徐某乙的姐姐，多次照顾徐某乙及其子。徐某乙在2023年3月2日立遗嘱，指定徐某甲为儿子的监护人。陈某同意徐某甲担任监护人，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长宁工作站也支持此决定。法院判决徐某甲为陈某乙的监护人；陈某的代理人居委会负责指导和监督；而上海市长宁公证处在陈某乙未成年期间，对陈某乙及其母亲陈某的财产进行监管。在此案中，上海市长宁公证处作为第三方机构介入，同时也作为法定提存部门为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提存服务，充分发挥了公证制度的服务、沟通、证明、监督功能，有效解决了当事人的迫切需求。

在前述案例中A女士面临的困境与徐某甲申请指定监护人案具有相似性，均具有需要保障自己身故后子女的未来生活的需求。结合该案例的司法实践，我们可为A女士提供以下解决路径：首先，A女士可依据《民法典》第二十九条关于遗嘱指定监护的规定，在遗嘱中明确其信任的亲属或友人（比如她的兄弟姐妹）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同时明确监护人的职责范围，并参考徐某乙的做法，通过公证加强遗嘱公信力与约束力。其次，可借鉴长宁区人民法院的裁判思路，由居委会等基层组织或专业机构出具支持意见，并提供指导，强化监护的合理性。最后，可由公证处监督财产使用，确保孩子及其监护人的权益平衡。这一解决路径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

1. 参见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23)沪0105民特128号民事判决书。

治，又通过公权力适当介入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形成“遗嘱指定+机构监督”的双重保障模式，有效解决A女士最忧虑的问题。

父母在遗嘱中指定其信任之人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此举通常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子女的利益。也正是因为其体现了民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因此在法定监护与遗嘱指定监护发生冲突时，遗嘱指定监护的效力应优先于法定监护。例如，六岁的萱萱（化名）的母亲因司法鉴定被确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萱萱的父亲江某志在临终前立下遗嘱，委托其妹妹江某芬在自己去世后担任萱萱的监护人。萱萱的外祖父熊某某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依据法定监护的顺序，将监护人变更为自己。法院根据法定监护的相关规定，裁定萱萱的监护人变更为熊某某。然而，江某芬基于江某志生前所立遗嘱以及更有利于萱萱成长的考量，向法院提起诉讼。最终，法院裁定撤销熊某某作为萱萱监护人的资格，并指定江某芬为萱萱的监护人。² 法院的上述裁判逻辑也为A女士进行遗嘱指定监护人提供了明确的指示。首先，父母通过遗嘱指定监护的行为属于符合法律规定的意思自治范畴，效力上优先于法定监护顺序。此外，一旦法定监护人与遗嘱指定监护人就监护权发生冲突，司法机关会实质审查遗嘱指定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如经济条件、与被监护人的情感联系等，并最终以“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为裁量基准，综合评估被监护人生活稳定性、心智障碍者医疗康复等特殊需求之类的要素作出裁判。据此，A女士可通过公证遗嘱明确指定具备照护能力与意愿的亲属作为监护人，并附具子女特殊照护需求的书面说明。若未来发生监护权争议，法院将优先尊

重其遗嘱意愿，并结合被指定人实际履行能力作出最终裁决。

（二）意定监护协议公证

意定监护制度是指成年人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前提下，依据个人意愿，自主挑选值得信赖且适宜的个人或机构，并通过书面协议等法律文件形式，指定其在自身丧失行为能力或认知能力时担任监护人，负责对个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维护和管理，并代表其进行民事活动的法律安排。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中，卢某申请指定监护人案充分体现了意定监护制度能够确保老年人依照自己的意愿，安排晚年生活的优势特点。杨某与配偶无子女，配偶去世后，与配偶的侄子卢某签订经过公证的意定监护协议，约定卢某为杨某失去民事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杨某患病后，卢某申请法院认定杨某无民事行为能力，并指定自己为监护人。法院审查后认定杨某无民事行为能力，并确认意定监护协议合法有效，支持卢某成为杨某监护人。上海市普陀公证处亦曾为两位年过八旬、独子在海外工作的老人和他们多年的同事、朋友兼邻居办理《特定情况下代理与意定监护协议》公证。此举确保了二老在将来失能失智状况下拥有监护人，并在思维清晰但行动不便时，能够委托代理人处理事务。老人的儿子亦成为此次意定监护的监督人，负责监督监护人是否依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全面执行监护职责。此外，两位老人还签署了一份“生前预嘱”，在该预嘱中，他们在意识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明确表达了对自己未来的医疗、居住及后续安排的意愿。

意定监护协议除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外，并无

2. 参见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22)渝0115民特37号民事判决书。

其他的程序性规定，根据《袖珍民法典评注》中的观点：“为使他人根据公权的权威而信赖当事人间订立意定监护合同之真意，还须公权继续为其‘加持’。”³ 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办理意定监护协议公证，可以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意定监护协议公证是意定监护制度有效运行的有力保障。综上，A女士对于自身晚年生活的安排，可参考意定监护协议公证的模式，在意识清醒时选择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亲属或友人，与之签订意定监护协议，明确监护范围及监督机制，可以在协议中同时安排其他亲友作为监督人，并通过公证强化协议效力。当A女士未来行为能力缺失时，指定监护人可向法院申请确认监护资格，确保A女士能够安度晚年。

（三）社会组织担任监护

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心智障碍者家庭常常遭遇缺乏其他亲属作为孩子监护人，或虽有其他亲属朋友但其不愿或无法承担监护责任的困境。2024年，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案件时，作出裁决，指定社会组织“尽善监护”担任一名精神障碍老人的监护人。⁴ 陆女士年近七旬，父母及丈夫均已离世，其子因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症而住院治疗。陆女士与兄弟姐妹长期失去联系，尽管有关部门尝试联络，他们仍不愿担任陆女士的监护人。陆女士户籍所在地为闵行区“社区公共户”，并无对应的管辖居委会。闵行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积极寻求民政部门的协助以寻找解决方案。在陆女士户籍所在地街道及闵行区民政部门的推荐下，法院经过多轮接触、沟通和观察，认为“尽

善监护”作为全国首家专业从事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的监督和指导下，已积累多年丰富的服务案例和实践经验，并通过多方面的了解，确认民政部门、公证处以及其他当事人、监督人对该社会组织服务的认可度高，因此，依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的“非讼程序案件案由”，人民法院通过“特别程序”，判决指定“尽善监护”为监护人，此案例成为上海法院首次指定社会监护组织担任监护人的案件。这一“首例”的出现，标志着随着专门从事监护服务的组织运作日益成熟，前述案件中A女士在无法为她的孩子于自己亲友范围中确定合适监护人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委托社会监护组织或者向法院提出指定监护申请，申请特定单位作为监护人这一新的选择。

（四）监护人的道德风险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第三十一批指导性案例中的李某滨与李某峰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支持起诉讼案，充分体现了监护人的道德风险问题。⁵ 李某滨为智力三级残疾人，其弟李某峰以监护人身份出售了李某滨的房产，并将所得款项用于个人治疗。李某峰还通过“假离婚”手段转移了这笔售房款。结果，失去住所的李某滨不得不入住养老院，而唯一照料他的姐姐李某光也无力承担其在养老院的费用。

监护人有责任依法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防止其受到侵害。然而，从该案例中可以看出，监护人私自挪用被监护人财产，导致被监护人财产受损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依然存在。尽管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要求监护人赔偿损失，以实现救济，但心智障碍的被监护人在诉讼能力上存在不足，难以独立

3. 杨代雄主编：《袖珍民法典评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25页。

4. 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4）沪0112民特206号民事判决书。

5. 参见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20）津0103民初2059号民事判决书。

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自身权益，且救济过程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因此，即便父母为心智障碍的子女指定了监护人，他们仍会担忧自己去世后，监护人可能不履行职责，甚至挪用子女的生活费等问题。这就涉及到财产管理的问题，父母留给有心智障碍的孩子的财产是这些孩子未来生存和生活的重要保障，确保资金不被随意提取和挥霍也有相应的制度保障。

三、信托与提存公证协同机制：特殊需求家庭财产管理之双重保障

综合上述分析，若特殊儿童家庭的父母期望能确保未来遗留的财产专用于子女，父母可将资产借助设立信托之方式，交由独立账户或相关机构进行监管。《民法典》和《信托法》都对遗嘱信托这一财富传承方式予以了支持，明确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其中遗嘱就是书面形式之一，设立遗嘱信托，应当遵守《民法典》继承篇中关于遗嘱的规定。

笔者在社会调查中关注到，目前特殊儿童群体的家长们对信托公司信任度不高，普遍希望有公信力的部门参与到特殊儿童日后的照顾和家族财富传承。因此遗嘱信托公证和提存公证的协同机制或许能够成为解决这些家庭烦恼的最佳方案。

公证遗嘱是《民法典》中确立的具有显著检认优势的一种遗嘱形式，在前述案例中，A女士可办理遗嘱信托公证。在遗嘱中，A女士可以在遗嘱中明确指定其去世后财产的管理人和分配方式，包括受托人身份、受益人范围以及管理财产的具体范围和方式。在设立遗嘱信托之后，还可以指定一名信

托监察人，负责监督信托的运作，确保信托财产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在适当的条件、期限和阶段内分配给受益人。此外，父母还可以购买重大疾病保险和终身寿险，以在自己遭遇重大疾病时获得大额理赔金，为自己提供额外保障，并可设立保险金信托，将保险金的权益纳入信托管理。

因此，若特殊儿童家庭的父母期望能确保未来遗留的财产专用于子女，父母的资产可借助设立信托之方式，交由独立账户或相关机构进行监管。公证机构亦可为心智障碍者家庭提供提存公证服务，协助当事人家庭预先规划财产使用，例如规定每月领取额度，以及在特殊情况下如何领取等事宜，从而在财产管理方面对选定的监护人实施监督与限制。例如，在江口县人民检察院处理陈某某司法救助案件的过程中，除了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外，还考虑到了诸如年老患病者、残疾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在司法救助金管理上可能面临的监护人挪用或滥用问题。因此，江口县人民检察院与江口县司法局共同制定了全省首个《特殊人群司法救助金提存管理办法（试行）》，建立了分期发放、第三方监管的“检察+公证”协作监管模式。⁶检察机关依据被救助人的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的资金发放方案，而公证机构则设立提存专用账户，全面负责救助金的提存、保管和发放工作，确保救助金专款专用。陈某某成为该县实施公证提存管理机制后的首个救助案例。依据法律规定，为陈某某“量身定制”司法救助金的发放方式，实行按月及按需发放，确保救助金能够用于老人家庭生活和康复医疗等紧急需求。尽管该案例是由检察院主导的司法救助金监管发放模式，但此模式可推广至公

6. 参见《江口：公证提存机制实现救助金专款专用》，载《贵州法治报》3月31日第4版。

证机构为心智障碍者家庭设计遗产管理公证方案，以实现遗产管理过程的监督，确保遗产得到妥善保管和合理运用。

四、心智障碍者家庭房产处置困境及居住权设立的法律解决方案

根据调查和数据统计，我们发现许多特殊儿童的家庭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由于大多数心智障碍者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家长们在考虑将房产赠与自己的心智障碍子女时，会感到忧虑。他们担心心智障碍的子女可能无法独立妥善地管理和处置这类重要的财产，而且这些子女还容易成为诱导和欺骗的目标。此外，考虑到大多数心智障碍者终身未婚未育，不动产的继承问题也变得复杂和棘手；如果家长们选择将房产赠与那些照顾心智障碍子女的人，又会担心赠与之后，心智障碍子女的权益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设立居住权的方式可以为许多心智障碍者的家庭提供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居住权是指权利人对他人所有的住宅享有的使用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具有排除所有权人效力的用益物权，它允许居住权人长期稳定地、排他地对他人房屋进行独占性支配。根据《民法典》第三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居住权可以依据遗嘱设立。一旦房屋设立了居住权，即便房屋所有权在将来发生转移，居住权人依然享有继续居住的权利。因此，对于心智障碍者家庭的父母来说，在确定了合适的监护人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照顾心智障碍子女的监护人或照料者，并通过合同或遗嘱等书面形式为子女设立居住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居住权人

是不允许将其拥有的居住权进行二次转让的，同时居住权也不会由居住权人的继承者继承。一旦居住权人死亡或者居住期限届满，居住权就会随之消失。

前述案例中 A 女士可通过遗嘱将其所有的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给其为孩子指定的监护人，同时以遗嘱形式为子女设立终身居住权。这种设计既能确保监护人获得照护成本，又凭借居住权的特性保障了孩子终身居住权益。即使监护人发生变更或房产被抵押转让，居住权仍受法律保护。

五、总结

心智障碍者家庭的未来托付，核心在于两大命题——监护权的妥善安排与财产权的妥善管理，这是父母为子女长远考量的重要切入点。面对心智障碍者家庭的种种忧虑，公证法律服务机构以严谨而温情的姿态，为他们提供了三重保障：通过遗嘱公证，父母可指定子女的监护人，让爱与责任突破时间的限制，持续守护子女的未来；通过意定监护公证，未雨绸缪地规划父母失能后的自身照护问题；通过信托与提存公证的协同运作，将财产定向传承，以精细化财产管理约束监护人权力，既赋予灵活性又设置安全阀，让每一分钱都成为子女生活的坚实后盾。

公证处量身定制的综合法律服务方案，正是将这些法律工具和业务模式转化为个性化的生命保障脚本，以专业之力弥合焦虑，以制度之稳承托深情。正所谓“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份长远谋划不仅是当下的庇护，更是穿越时空的爱的守望。当法律与亲情交织，我们终能为孩子筑起一座无惧风雨的港湾，让未来在制度与人性之光的双重照耀下，步履不停，生生不息。

（本文作者系临港公证处主任）

继承公证中 涉及养子女有关问题的探讨

◎ 胡晓瑾

收养是自然人依据法律规定领养他人子女为自己子女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产生身份关系变更、亲属间权利义务转变的法律后果。我国关于收养的法律规定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变迁，即从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颁布（1992年4月1日起施行，共33条，以下称“原收养法”）、到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修订（1999年4月1日起施行，共34条，以下称“新收养法”）、再到2020年被整合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编婚姻家庭编第五章收养（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共2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同时废止）。

公证实务中，收养关系的成立或解除对办理继承案件而言影响重大，本文拟对继承公证中涉及养子女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收养关系的成立与继承公证

收养关系一旦成立，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形成拟制血亲关系，养子女享有与生子女相同的权利义务，而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则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因此，收养关系成立与否对于办理继承公证的意义不言而喻，主要表现在：

1. 法定继承人资格中，养父母与生父母、养子女和生子女、养兄弟姐妹和亲兄弟姐妹的继承顺序

相同。

2. 代位继承中，被继承人养子女的生子女、被继承人亲生子女的养子女、被继承人养子女的养子女、与被继承人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养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

根据原收养法和新收养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如何认定收养关系的成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1992年4月1日前的事实收养阶段。该阶段仅限于1992年原收养法实施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收养关系，当时收养关系的成立、收养程序、效力、解除等并无专门的法律规定，更主要的是散见于一些法律或部门规章的条款中有所涉及，如：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规定：“收养子女，必须经过生父母或监护人和养父母的同意，子女有识别能力的，须取得子女同意，再经有关部门办理收养手续，进行户籍登记”；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者有关组织证明养父母与养子女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1993年司法部《关于办理收养法实施前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公证的通知》规定：“对于收养法实施前已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可以申办事实收养公证。凡当事人能够证实双方确实共同生活多年，以父母子女相称，建立了事实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且被收养

人与其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已消除的，可以为当事人办理收养公证。收养关系自当事人达成收养协议或因收养事实而共同生活时成立。”由此，事实收养关系成立认定的主要标准包括：(1) 双方以父母子女的身份相称，共同生活多年；(2) 亲友、群众认可其为父母子女；(3) 与生父母权利义务关系消除。也就是说，我国对于原收养法实施以前的“事实收养”是有条件地予以承认。该期间的收养关系，当事人可以签订收养协议或申办公证，但非收养关系成立的必需条件。

2.1992年4月1日至1999年3月31日期间成立的收养关系。该期间的收养关系成立分为三种形式：(1) 向民政部门登记，其中收养查找不到父母的弃婴或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必须办理登记，其他的不强制登记；(2) 收养人与送养人以及征得10周岁以上被收养人的同意并订立书面收养协议；(3) 收养人与送养人一方或双方要求公证的应办理收养公证。以上形式除第一条必须登记的情形外，其他符合其中一种即成立收养关系。

3.1999年4月1日后的收养登记成立阶段。新收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也就是说，新收养法实施之后发生的收养行为，必须办理登记手续才能成立收养关系；未办理登记手续的，收养关系因缺乏法定实质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

继承公证中，在上述第2或第3阶段成立收养关系的继承人一般比较容易认定；对于在上述第1阶段成立收养关系的继承人，可以通过户籍登记、人事档案记载、证人证言、有关书证记录等多方证明予以验证。

二、收养关系的解除与继承公证

收养关系作为拟制血亲关系，与自然血亲关系不同，在符合规定条件下可以解除养父母子女间的关系。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养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即行消除，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自行恢复（成年养子女除外）。

收养关系的解除方式目前有两种：

1. 协议解除。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或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与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此种解除首先由双方签订解除收养关系协议。新收养法实施前，如果收养关系是经民政部门登记成立的，还应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的登记手续；收养关系是经公证证明的，应到公证处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的公证证明；新收养法实施后成立的收养关系则均应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登记手续。

2. 诉讼解除。收养双方不能达成解除收养关系协议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调解出具调解书或作出判决。调解书或判决书生效后，养父母子女关系即解除。

基于收养关系可以解除，因此在继承类公证中，如出现收养关系解除的情形，应着重审查解除的方式是否符合规定以及明确解除的时间节点。

三、继承公证中继父或继母收养继子女的情形

继父或继母经继子女的生父母同意可以收养继子女，收养流程为继父或继母经继子女的生父母同意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手续。如该继父的再婚

配偶是该继子女的生母，表现在收养登记证上的收养人为原继父、送养人为生父，生母与该子女的关系仍保持，不能作为送养人，反之亦然。

该类收养的法律后果表现在：1. 原继父或继母与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收养成立后成为养父或养母与养子女关系；2. 原继子女被继父收养后，与生父及其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消除；原继子女被继母收养后，与生母及其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消除。

表现在我国的继承法律规定中，原继父或继母和继子女间的继承资格必须要有扶养的前提，而且继父或继母继承继子女的遗产不影响其继承生子女遗产、继子女继承继父或继母的遗产不影响其继承生父母的遗产。但收养关系成立后，如继子女成为继父的养子女，则只能继承该养父（原继父）的遗产，不能再继承生父的遗产，但可以继承生母的遗产；继子女成为继母的养子女同理，只能继承养母（原继母）的遗产，不能再继承生母的遗产。

实践中，继父或继母收养继子女的情形较少，一般出现在涉外收养中，外籍继父或继母因拟申请继子女出国便利而办理收养手续，这种收养手续既包括根据我国收养法律规定在中国的民政局办理收养登记手续，也包括继父或继母直接在国外申请办理收养继子女的手续。

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的规定：“收养的条件和手续，适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收养的效力，适用收养时收养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因此，若是涉外继承中涉及继父或继母成为养父或养母的情形时，应着重关注该收养的效力是否符合收养人经常居住地的法律。

以日本为例，实践中如中国籍生母与日籍人士结婚，为便于申请人本人及子女前往日本，往往会要求日籍丈夫在日本申请办理收养继子女手续。但与中国收养制度不同，日本的收养分为普通收养和特别收养两种制度。普通收养关系成立后，虽然其日本户籍中登记称谓为养父和养子女，但该养子女（即原继子女）与生父或生母之间的亲属关系仍然保持，所以仍然可以保留对亲生父母遗产的继承权，这与中国继承制度中的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身份类似；而在特别收养中，养子女与生父或生母的血缘关系在法律上被切断，他们将丧失对生父或生母遗产的继承权。因此，在该类继承案件中，日本普通收养的养子女地位 = 中国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继承地位，特别收养的养子女地位 = 中国养子女继承地位，不能因日本户籍登记中记载为养父母子女关系就一概默认为该养子女不能继承其生父母遗产。

由此，如果继承公证中涉及收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有涉外因素，应通过外国法律查明途径或由中外法律专家提供对该收养的效力加以认定说明，从而判断该养子女是否确实丧失对生父母遗产的继承权。

综上，在公证实务中遇到涉及养子女的继承案件时，我们应当严格审查收养登记证书、解除协议或生效裁判文书等材料，重点核实收养关系的成立时间、解除效力以及是否存在特殊约定。对于涉外收养或事实收养等特殊情形，还需结合相关特别规定审慎认定。若未能准确识别收养关系状态，可能导致遗漏合法继承人或错误认定继承人资格，直接影响公证文书的合法性和公信力。

（本文作者系东方公证处公证员）

打通商事纠纷调解的“最后一公里”

浅谈“赋强公证”在商事纠纷调解中的作用

◎ 朱燕明

商事纠纷调解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高效、灵活的特点被广泛应用,在化解商事纠纷、优化营商环境、完善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然而,传统调解协议因缺乏强制执行力,常面临“调而不履”的困境。在此背景下,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以下简称“赋强公证”)通过法律赋权与程序保障,进而与商事调解深度融合,将更加有效地提升商业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是提升调解效能的关键工具。本文将结合一则实务案例,探讨赋强公证在商事纠纷调解中的核心作用及优化路径。

一、案情简介

甲工业公司和李某某拖欠乙小额贷款公司借款本金2000万元,逾期利息达500余万元。借款人李某某以其所有的位于上海市的房产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已办理抵押登记。经多次协商,双方初步达成一致意见,约定借款人先偿还借款本金1900万元,剩余100万元本金分五期归还,并支付逾期利息。若借款人在规定时间内履行还款义务,贷款人将减免部分逾期利息。然而,尽管双方就还款金额达成一致,但在具体操作方式上仍存在分歧。

借款人希望在与贷款人达成还款协议后,贷款人先行撤诉,然后双方履行还款协议;而贷款人则担心签订的还款协议缺乏司法强制力,若借款人后续不按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自己只能再次起诉,面临诉讼排期和司法执行等程序延宕和不确定风险,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成本。

二、赋强公证对于商事纠纷调解的介入路径

乙小额贷款公司就该情况向上海市闸北公证处咨询,询问公证处是否能提供相应法律服务,既能够相较于等待法院开庭、判决和执行更为高效,又能使双方还款协议获得类似裁判文书的强制效力保障。

公证处结合案件背景对该案进行法律分析,并且深知贷款人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还款协议能否切实履行直接关系到其经济利益的实现。在经济活动中,还款协议的签订较为常见,但如何确保协议能够切实执行,一直是各方关注的重点。基于此,公证处建议贷款人与借款人协商,在还款协议中约定由双方向公证处申请对还款协议赋予强制执行效力。随后,公证处向贷款人详细介绍赋强公证的作

用和优势，并耐心解答其提出的各种疑问，包括赋强公证的申请流程、所需材料以及注意事项等。借款人同样希望能够固定双方之前达成的协商成果，在贷款人已做出利息让利的条件下，尽快签订还款协议，以尽早清偿债务并注销房产抵押。因此，当得知可以通过公证方式更高效且更具公信力地订立还款协议时，借款人也欣然表示同意。

在公证处向争议双方详细阐释法律依据与赋强公证作用的基础上，争议双方共同提出了对还款协议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申请。在充分了解双方的公证意愿后，公证处对经调解初步达成的还款协议进行了严格审查，并将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条款加入还款协议中。该条款明确规定，若借款人（还款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贷款人可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借款人放弃抗辩权，自愿接受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同时，协议中还明确了贷款人的后续义务，即配合抵押人办理注销抵押登记手续，并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最终，双方对这次由公证处介入推动调解并达成协议，以及通过赋强公证保障协议具备法律强制执行力的结果都非常满意。

在此案中，公证处充分发挥公证在预防和化解矛盾中的专业优势，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积极探索“公证+商事调解+金融”专项公证服务，将商事调解与公证深度融合，通过构建“公证调解—赋强公证—执行保障”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致力于推动商事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实现纠纷预防与化解的有机统一，为金融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三、通过赋强公证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上述案例办理赋强公证后，借款人迟迟没有还款，贷款人经多次催款无果，向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公证处收到申请便第一时间联系借款人，询问其协议履行情况以及迟延履行原因。经充分沟通得知，借款人对于抵押房产的处理存在顾虑，其寄希望于等待房价上涨以获得更高额度的抵押贷款或者售房款，于是一直拖延履行先前达成的还款协议。了解上述情况后，表示贷款人已经向公证处申请执行证书，并依法向其告知不履行赋强公证债权文书的法律后果。借款人表示其愿意继续履行协议，希望公证处就出具执行证书事宜与其保持沟通，并提出希望公证处为其案涉房产的贷款、买卖提供相应法律服务，以帮助其顺利获得资金偿还欠款。公证处秉持服务至上的执业态度，致力于帮助双方当事人真正化解纠纷，解决实际问题，积极为其提供金融机构融资贷款和房产交易方面的综合法律服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借款人积极配合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并确定房产买家，准备出售房产履行还款协议。但是随之产生了新的问题，考虑到借款人之前的信用状况，买家（第三方）对于这笔交易不免顾虑重重。如何才能切实保障买家权益，确保交易顺利进行，亟待公证处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在交易面临信任危机的情况下，公证处敏锐分析出了交易僵局的症结所在，为三方当事人提供了化解危机、达成交易的全新思路——办理提存公证。提存公证是公证机构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债权人的利益而交付的债之标的物或

担保物（含担保物的替代物）进行寄托、保管，并在条件成就时交付债权人的活动。债的双方在合同（协议）中约定以提存方式给付的，公证机构也可以办理提存公证。简言之，在本案中，买家（第三方）将购房款打入公证机构指定的账户中，由公证机构监管，在借款人（卖家）将案涉房产成功过户到买家（第三方）名下后，公证机构再将监管的购房款支付给借款人（卖家）。同时，由于房产存在贷款人的抵押，其顺利过户有赖于贷款人的配合，且借款人与借款人（卖家）有赋强公证的还款协议且贷款人取得了执行证书，因此，在交易过程中首先将一部分购房款用于清偿贷款人的全部债务并解除房产抵押。通过提存公证，贷款人拿回了欠款，借款人（卖家）成功出售了房产并拿到了扣除借款后的购房款，买家（第三方）没有任何风险地买到了房产。可以说，通过提存公证，三方取得了共赢的结果。

提存公证通过提供中立的第三方保管服务，既保障债务人依法履行债务、免除违约责任，又确保债权人在条件成就时实现权利，成为破解“履行难”的重要法律工具。随着市场交易的多元化及复杂化发展，信任危机时常发生，由于信任机制的缺乏，往往导致市场商业活动不能正常开展。此时，为预防、避免纠纷，提存公证充分发挥公证作为预防性司法制度的职能优势，预防纠纷，保障交易安全。以公证机构作为“信用中介”，通过办理提存公证来弥补交易各方信任的缺乏，更能得到交易各方的一致认可。

通过办理提存公证，公证处充分利用自身中立客观地位优势，有效化解交易各方的对立冲突情绪，

为互不信任的各方当事人提供权威的信用保障；同时公证员发挥法律专业优势，准确破解交易中的痛点堵点，紧密结合纷繁复杂的个案情况，为当事人设计量身定做的专门提存公证方案，规避交易中可能引发纠纷的风险隐患，从而为交易的顺利达成排忧解难、保驾护航。

四、经验总结

在金融借贷领域，还款协议的有效履行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赋强公证+金融工具+提存”的公证解决方案在本案例中的成功应用，说明了通过将赋强公证的强制执行力、金融工具的资源配置力、提存公证的风险防控力进行系统集成的巨大作用，充分彰显了其在保障债权实现方面的重要价值。它不仅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高效、便捷且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也为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是有利于提高债权实现效率。赋予还款协议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使得在借款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还款义务时，贷款人无需经过漫长的诉讼程序，即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大大缩短了债权实现的时间，极大提高了效率。在本案例中，如果没有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一旦借款人发生违约，贷款人仍需要经历起诉、举证、庭审等一系列繁琐的诉讼程序，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依靠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贷款人可以迅速启动强制执行程序，确保债权得到及时实现。

二是增强公证的权威性和可信度。经过公证的还款协议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公证机构作为独立的第三方，通过对协议的内容进行审查和确认，有效保障了协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可执行性。这不仅可以增强贷款人对借款人履行还款义务的信心，也可以让借款人更加重视自己的还款责任。在本案例中，公证机构的介入使得还款协议更加规范、严谨，双方在签订协议时也更加谨慎，从而减少了违约的可能性。

三是降低成本和风险。诉讼程序往往伴随着高昂的成本和风险。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等费用的支出，以及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都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可以有效规避此类风险。贷款人无需支付高

额的诉讼费用，也无需承担诉讼风险，只要贷款人不履行还款义务，经过公证机构核实并出具执行证书，就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不仅降低了贷款人的维权成本，也有利于敦促借款人履行还款义务，提高了债权实现的确定性。

四是保障交易安全、促进交易顺利进行。面对交易中常常出现的“信任僵局”现象，提存公证提供了对于交易各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有效消除了交易中的信任危机，保障了资金安全交付。其核心价值在于防控风险、预防纠纷，充分利用公证机构的中立地位，通过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督促各方履行提存协议，从而破解僵局、化解矛盾，促进交易顺利进行。

（本文作者系闸北公证处公证员）



闸北公证处公证员朱燕明为当事人办理公证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 的新动向

◎ 何玉祺 杜忆妍

近年来,我国婚姻家庭矛盾增多,家事纠纷案件数量高位运行,财产分割成为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公布,公证机构作为法律服务重要组成部分,要依据其明确财产归属、保障子女权益、促进家庭和谐、实现减证便民、预防和化解家庭矛盾,为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一、夫妻房产给予行为的处理规则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五条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时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登记,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一方所有,并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给予方有证据证明另一方存在欺诈、胁迫、严重侵害给予方或者其近亲属合法权益、对给予方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等情形,请求撤销前两款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三十二条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或者共有,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实务操作及问题

实践中,基于婚姻关系给房导致纠纷的情况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婚前或婚后约定将一方房产给予另一方或者为另一方“加名”,但并未办理变更登记,之后承诺一方依据《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进行撤销赠与,导致另一方利益受损;二是骗婚,为了房屋结婚,房屋登记后立刻“闪离”。由于婚姻关系存在较大的私密性和差异性,背景情况纷繁复杂,难以用统一标准对不同情况予以划分。新解释将“赠与”调整为“给予”,强调综合因素的考量,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避免“一刀切”导致损害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生,可以更加人性化地对案件进行分析研判。

从公证角度分析，在未出台《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之前，很多夫妻通过办理赠与合同公证来规避后续赠与方可以任意撤销赠与行为的法律风险。现在是否可以认为按照新规定和办理公证赠与合同有同样效果，给予方也不能任意撤销，赠与合同公证没有必要？笔者认为，该法第5条规定旨在避免简单适用赠与合同规则，强调了夫妻间给予房屋的特殊性，是对原有解释的细化而不是取代，公证的必要性并未减弱。首先，如果房产未及时过户，公证仍可以作为保障接受方权益的重要手段，即使用该法第5条，公证后的协议也能明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减少法院自由裁量的不确定性。而若是当事人间有特殊约定，给予方希望房产在离婚时仍归接受方所有，可在公证的赠与合同中明确约定该赠与独立于婚姻关系，即使离婚也有效。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双方明确表达了该给予独立于婚姻关系的意愿，在离婚情形下仍然有效，属于单纯的赠与，不依附于婚姻关系而存在，则可能无法适用该法第5条，需按照赠与合同规则处理。此时公证就显得尤为重要，利于当事人提前规避风险。

二、父母出资购房的认定与处理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八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子女一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

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资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合理补偿。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

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原则处理。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实务操作及问题

在子女结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是我国目前普遍的现象。《民法典》第1062条、1063条和第1065条确立了我国基本的夫妻财产制度。据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原则上为夫妻共同财产，除非赠与合同中明确约定只归一方。但在实际生活中，考虑到情谊、担忧伤感情，父母在为子女出资购房时很少会有明确的赠与合同，更少明确约定只归自己子女一方。正因如此，在子女离婚财产分割引起纠纷时如何判定父母给子女购房出资款项的权属就产生了较大困难。

笔者认为，新解释强调赠与合同约定的重要性，区分全额出资与部分出资的情形，更注重公平和家庭贡献。在这一背景下，公证更显出重要意义，可以作为一个重要法律工具对赠与合同起到强化作用，减少法律纠纷，为法院提供更清晰的判断依据，有助于更好地规避风险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三、继父母子女关系成立、解除及权利义务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

对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中继子女受继父或者继母抚养教育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以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期间继父母是否实际进行生活照料、是否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是否承担抚养费等因素予以认定。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

生父与继母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后，当事人主张继父或者继母和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不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继父或者继母与继子女存在依法成立的收养关系或者继子女仍与继父或者继母共同生活的除外。

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继父或者继母请求曾受其抚养教育的成年继子女给付生活费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抚养教育情况、成年继子女负担能力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但是继父或者继母曾存在虐待、遗弃继子女等情况的除外。

实务操作及问题

在这一规定出台前，公证机构在处理继父母子女关系时主要依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规定，但这些规定较为笼统。实践中有一类特殊情况，在继承人曾有多段婚姻，在其中某一段婚姻中存在继子女，但后续婚姻情况发生变化，与该继子女的生父母离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公证机构通常会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如共同生活的证明、抚养费用的支付记录等，需要该名继子女到场确认情况，审查婚姻关系存续时间、抚养教育情况等。当事人往往难以提供有关材料，最终只能向法院寻求救济，费时费力。

新解释出台为公证实践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笔者认为，《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19条中对于“当事人”的定义应采用扩大解释，不止局限于继子女或父母，而应包含具有利害关系的人。在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后，依当事人主张，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解除继父母子女关系，

那么双方的继承权基础归于消灭，故继承关系不应继续存在。可以说，新解释为公证机构处理继子女继承权相关事务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大大降低当事人举证难度。

四、离婚协议中财产给予子女的约定及履行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

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另一方同意的除外。

一方不履行前款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请求其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子女可以就本条第一款中的相关财产直接主张权利，一方不履行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子女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由该方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有证据证明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同时请求分割该部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处理。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七十条

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

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实务操作及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夫妻签订离婚协议分割财产时，出于保护子女利益、特定夫妻共同财产难以具体分割或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价值和归属无法协商一致，会选择约定将共同财产的部分或者全部给予双方共同子女。但在离婚后，共同财产的实际占有方未必会按照离婚协议履行，甚至也有以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为由主动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协议的情况发生。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片面地认为共同财产的实际所有权人就是赠与人在赠与的财产权利转移之前享有任意撤销权。

笔者认为，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基于解除身份关系，就财产分割、子女教育等事宜协商一致的安排，具有人身与财产双重属性，其约定事项相互关联、互为前提，应从整体理解协议内容，不能生搬硬套适用任意撤销权规定。且赠与具有无偿性及明确意思表示，而离婚协议主体为夫妻双方，无法体现子女意志，其财产处理安排是双方妥协结果，不具赠与合同无偿性本质特征。新解释综合考虑社会现象、当事人意愿及子女利益，给了司法实践明确指引。

在公证实践中，针对上述情况，基于诉讼周期、费用或是其他考量，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共同申请赠与公证来保障子女利益。夫妻双方将共同财产赠与子女的行为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该行为不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如果具体情况满足公证受理条件，公证机构可以受理该申请。此外，由于婚姻登记机关对已经生效备案的离婚协议的变更不予受理，如果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了共同财产给予子女，且已经在婚姻登记处备案了，但双方经协商一致，想对该条约做出变更，可以订立补充协议，符合生效条件即具有效力。在实践中，往往会碰到协议双方对彼此不信任，想追求更强法律约束力，此时可以选择共同到公证机构申请针对协议书的公证，经审查，如果符合公证受理条件，公证员可凭专业性和严谨性帮助当事人审查协议内容，避免歧义，减少执行障碍，为双方合法权益的保障提供更加有力的证据支撑。笔者认为，考虑到弱势群体尤其是未成年子女财产权益的保护，在婚姻关系解除的前提下，基于诚信原则，不能允许任意撤销赠与。公证机构可以根据“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对当事人情况进行仔细审查，如对协议变更目的、父母经济能力收入情况、未成年人年龄及其亲子关系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向未成年子女如实详尽告知，询问其意见并录音制作笔录归档，给予暂缓期。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20条第三款赋予了子女请求权，而在此之前，子女是否能够独立行使第三人请求权是存在争议的。但离婚协议当事人仍为夫妻双方，子女不享有合同当事人的解除权或者撤销权等权利，只可以基于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的明确约定，如“坐落于xxx的房屋登记在男方A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经双方协商，在

离婚后，将房屋产权过户到子女B的名下，若离婚后未履行，B可以向A要求办理过户手续”等，向不履行义务一方直接主张相关财产的权利。

新解释也引发了新问题，如A与B离婚，协议中约定将A名下一套房屋给其子女C，A在办理变更登记前过世，该套房屋是否属于A的遗产？从公证角度有不同看法：一是公证人员应严格遵循不动产登记公示原则，上述房屋仍属于A的遗产，需要办理继承权公证；二是不动产登记公示原则不影响婚姻财产分割协议关于房屋权属约定的效力，虽然房屋登记在A名下，但子女C取得了相应债权，在调整夫妻财产关系领域物权法应当保持谦抑性，对婚姻法的适用空间和规制功能予以尊重，尤其是夫妻之间关于具体财产制度的约定不宜由物权法过度调整，应当由婚姻家庭法提供评价。实践中，多认可第一种观点，当事人需要提供具体权属凭证。当然，对于第二种观点，公证机构和使用部门还需继续探索，不失为研究方向。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的出台不仅为婚姻家庭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加明确和细致的法律依据，也体现了法律对家庭关系的尊重和保护。通过对夫妻房产给予行为、父母出资购房、继父母子女关系以及离婚协议中财产给予子女约定等条款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法律在处理婚姻家庭问题时的灵活性和人文关怀。未来，随着更多实践案例的积累和法律理论的深入研究，期待这些条款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更加精准和有效地运用，进一步促进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本文作者系静安公证处公证员助理）

“公证Pro”——论人工智能时代下公证发展的新模式

◎ 施燕红

Deepseek 的一夜爆火使人工智能相关话题又一次冲顶热搜，预示着人类正步入一个崭新的纪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各行各业都被迫重新审视自身定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公证行业来说，这股汹涌而来的智能化时代大潮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挑战？我们又能够为当事人带来具有怎样时代科技感的服务体验？这值得我们深思。

一、当前公证法律科技的应用

早在人工智能技术广为人知以前，诸如人脸识别、电子签名、区块链等一系列法律科技就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在了公证办证流程的各个环节中，共同构建起了当前公证科技的架构体系，其中包括：

（一）身份识别与核验

利用人脸识别等技术，公证员可以快速准确地核实当事人身份，辅助降低公证员肉眼辨别真伪的风险。同时结合区块链技术，实现身份信息的可信存证和各类材料信息的共享，提升公证人员获取数据的准确度和办证效率。

（二）远程视频公证

后疫情时代的开启，延续了对“远程”公证的运用。结合区块链、时间戳等方面的技术，利用其能对电子数据生成唯一哈希值的技术特性，保证办证过程中的所有数据信息能被及时固定且不受篡

改，突破了当事人必须“亲临”公证现场的传统办证模式，也能确保公证流程和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样为身处海外的国人跨境“远程”申办公证事项又提供了一条便捷的渠道。

（三）区块链自助存取证

目前已有不少公证机构推出了手机线上存证平台 APP，向当事人提供自助存证的服务，方便当事人随时随地上传证据。当事人只需打开手机上的存证 APP，按照提示步骤来保存的证据，不仅能够保证证据的真实性，还能降低因电子证据的易灭失性而导致的当事人取证困难等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取证的效率。不仅如此，但凡通过公证机构的官方存证 APP 所保存的证据，当事人若后续还有申请公证文书出具的需求，公证机构可以直接受理公证申请，加快当事人获取公证文书的速度，提升公证服务的效率。

（四）智能问答和线上办证

现在，越来越多的公证机构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已经通过接入智能问答系统来为当事人提供线上 7×24 小时的公证咨询服务，可以为当事人解答常见的公证服务及法律专业问题等。此外，当事人仅仅需要一部手机，就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按提示步骤上传相关的信息资料和图片，从而利用线上小程序等途径完成公证申请，经审核通过之后还可以选择邮寄方式送达公证文书，真正做到了“最多跑一次”，甚至是“一次都不跑”。

二、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对传统公证的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指的是一种能够模拟人类智能的技术，通俗来讲，就是可以像人类一样进行学习、推理和决策的技术，但其基础是必须紧密地依托大量的数据，才能针对性地提取出有用的信息，从而做出类似于人类经思考后的分析、预测或决策等。尽管目前公证领域尚未引入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技术，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迭代，未来人工智能参与到公证工作中来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创新科技的引入在为公证工作大大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必然会对传统的办证模式和现有的法规等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

（一）智能化的办证流程

在未来，人工智能技术接入公证办证系统后，智能化的办证系统将会帮助公证员审核当事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自动识别伪造或不完整的文件，对已经通过审核的申请系统可以自动完成案件受理，与此同时，系统也会向未通过审核的申请主体发送补充材料的通知。在获得当事人客户端授权指令后，智能化的办证系统会通过互联网数据库采集相关信息并提取有用的数据，或是主动识别合同条款等内容是否合法合规，最终自动生成公证书稿件提交公证员核准。整个办证流程可以大幅降低因人工操作可能产生的错误，且大大缩减了当事人申办公证的时间成本。

（二）公证员的角色转化和法规的推进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引入必然会导致公证员的传统工作模式发生变化——公证员的角色将从目前的“亲力亲为”的执行人，逐步转化为对电子数据处理过程的“监督者”以及最终结论的“决策者”。从申请到最终公证文书的出具，目前公证工

作中所存在的大量重复性、格式化的常规工作都将由人工智能办证系统自动完成。而这些转变在给公证工作带来便利，给当事人带来使用体验升级的同时，又可能会在另一种程度上弱化公众对公证的认识。也正因如此，在未来，诸如证明结果认定、法律责任归属等问题也必将被提上议程，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准则和行业操作守则等也亟需实时推进。

（三）数据流转的安全性

公证案件在办理的过程中往往会接触到大量的秘密信息，保障办证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如自然人的个人隐私、企业的商业秘密、政府机构的文件报告等各类信息的安全性，是公证工作能够持续稳定推进的重点之一。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是依托互联网数据库的，在未来该项技术广泛参与到公证工作中时，如何确保信息数据在使用和交换的过程中不会遭受泄露的风险，是公众对公证行业持续信赖的基石所在。

（四）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当前公证行业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仍以法学为核心，公证人员对创新型前沿科学技术的理解深度尚有不足。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更新，在未来，公证员对待案件的传统处理方式势必出现转变。倘若缺乏对人工智能的技术与应用有着深刻理解的公证人才，则必定会影响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此外，公证行业也需逐步建立起对人工智能、数据安全等方面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明确人才引入以及对从业人员技能培养的方向。

三、“公证Pro”——对未来人工智能化公证的畅想

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迭代更新，让我们感受到了目前传统公证身处在新时代科技大背景下的不

足。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和各地“减证为民”政策的深入推进，公证行业也必将持续向数据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基于公证自有数据库的智能化服务模式——“公证 Pro”将成为公证的未来。

（一）智能化公证服务将适配公证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更迭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社会大众对公证服务的需求已从传统的涉外、民事、合同公证，扩展到了更多的诸如电子数据交易、虚拟资产、“单身经济”等新生事物领域，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利用强大的互联网数据信息，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综合分析当事人的习惯喜好、消费能力甚至人事履历、人际关系网络等各类信息数据，自动为当事人匹配与需求相适应的公证项目，待获得当事人授权指令后，系统会向公证机构发送符合受理条件的公证申请和查找到的所有证据信息。未来的智能化公证既可以作为当事人日趋多样化的公证服务需求提供“总有一款适合您”的选择方案，也可以针对当事人个体情况的差异性量身定制提供个性化的“高级定制”服务。人们可能只需像淘宝购物一样在手机上勾选自己需要的公证服务项目，不多时就能收到一份电子公证书了，最终实现“足不出户，公证到家”的更高服务体验。

（二）智能化公证将大幅简化公证流程并实现“绿色”公证

基于强大的分析和预测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大幅简化公证的申办流程。首先，当事人只需发出简单的需求口令，智能化的公证办证系统即刻会为当事人推荐相适配的公证项目，当事人无需再为搞不清楚自己究竟该申请什么公证项目而发愁。其

次，在自动识别当事人所申请办理的公证案件的项目类型后，智能化公证系统会自主对互联网大数据中所有与本案相关联的数据信息进行查找和处理，当事人可免于提交相关的纸质证明材料，公证人员也无需再为搜集、核实证据信息而奔波于各部门机构间。最后，系统会主动将与案件有关的关键性要素提取出来，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生成公证文书，在将文书格式、排版等基础操作步骤进行系统化审核后，只需短短几分钟便可自动完成一份合法合规的公证书稿件，免去了人工打字输入的环节，降低了人工审核的工作量，也减少了因人为操作而可能产生的错误，从而大幅提升办证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如今国家和社会各界都大力倡导绿色环保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运用智能化公证系统，从公证申请到最终出具公证文书，整个办证流程都可以在线上完成操作，真正全面实现无纸化的“绿色”公证。

（三）强大网络安保系统保障数据安全性与真实性

公证工作除了需要经常性地与公安、民政等部门的数据平台相对接之外，还会涉及如个人隐私、企业秘密和政务机密等信息。人工智能技术在参与公证工作时必定也会触及大量敏感信息。针对如何保障信息的使用和传输不会泄露甚至遭遇黑客恶意破坏等问题，一方面，未来的智能化公证体系将十分重视对网络安全防御系统的巩固和维护，除了系统等级会紧跟前沿技术的迭代更新以外，它还能自动联合量子安全等新型技术，应对未来因全球计算能力的普遍提升所带来的信息安全问题，同步推进网络安全保密性能；另一方面，强大的数据库技术将在公证数据存储中被深化应用。未来的智能公证数据库网络系统将更趋强健，不会轻易被单点故障

所影响，而对数据库的使用也将同时配备“客户授权 + 公证机构公钥加密 + 公证员密钥签名”的“三保险”模式，以保证公证在办理过程中共享、使用数据时的防伪造和防篡改，而且在整个办证过程中所有要经手的数据也都会被智能“脱敏”，即：智能公证系统可以在不泄露用户隐私的前提下完成公证办理全过程。此外，由于智能化公证的强大安保系统能保护公证办理过程中所引用的数据信息不被泄露。因此，如果充分利用该项技术，不但能够体现未来的公证行业对证据管理、信息掌控的智能化程度，还能为有诸如“在先使用”等特殊商业秘密保护需求的企业、机构等提供数据储存认证服务，这类服务项目能够在不显露客户任何信息的前提下，确保用户所上传的电子数据的安全性，从而为市场提供一种更贴合客户深层次需求的公证服务体验。

（四）加快建立复合型公证人才战略储备工程

未来的智能化公证不仅需要专业技术人才，更需要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这类人才不仅能将法律规则与技术逻辑相结合，还能确保智能化公证工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此，人才是智能化公证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培养和吸引优秀的高素质人才、建立针对公证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储备工程，是支撑起未来构筑智能化公证战略设想的坚实基础。也许在未来的高校法学课程中将增设人工智能技术版块，培养跨学科应用型人才，以适应新时代的公证及其他司法类工作；与此同时，推动学校、科技企业和公证机构三方联席合作，增设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实验室，不但可以为学员提供实习岗位，提升技术实操技能，甚至对优秀学员可予以毕业直接录取就业。同时，在公证行业内适时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执业培训，明确技术操作和理论能力须同步

的晋升标准等，从而促进行业从业人员整体专业素养与时代技术革新同步。

（五）技术辅助、以人为本

未来的公证领域中的人工智能技术，除了能够自动化处理公证流程中的常规性任务、利用大数据网络与信息处理的优势来提升公证工作效率以外，更能够为公证员提出高适配性、超优化的决策建议，“人机协同”必将是未来公证工作的常态，传统公证员的日常工作重心也必然需要得到重新审视。但人工智能技术归根结底仍然应落实于其作为“工具”本身——辅助公证员更好地处理各类数据信息、为当事人提供高效服务的技术工具，这才是其应有的角色定位。而诸如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识别、公序良俗等人类社会价值观的平衡判断，以及人文关怀的考量和最终公证案件的结果认定等，都必须坚持出自承办公证员本人，从而有效避免人类对未来科技所担忧的技术算法工具凌驾于人伦道德之上的现象出现。

四、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为公证行业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无限可能，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公证模式的深度融合将是时代的趋势。如何在科技进步和行业发展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作为新时代的公证人，这就要求我们应当以积极的心态拥抱技术革新，勇于尝试人工智能技术在公证领域的应用，不断探索公证员在新时代技术下的角色转变。但同时也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潜在的风险，重视人类对技术决策的控制权，期待一个 Pro 版本的“智能公证”在未来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文作者系黄浦公证处公证员）

浦东新区司法局公服处 调研走访临港公证处

4月10日，浦东新区司法局公服处处长俞四海、副处长礼娜赴临港公证处调研。

公服处一行实地参观了临港公证处本部办公场所，深入了解窗口服务、便民措施等情况。座谈会上，临港公证处党支部书记、主任丁闻就公证机构业务开展、团队建设、质量把控等方面作了介绍。俞四海、礼娜对临港公证处各项工作表示肯定，并希望在未来发展进程中要注重公证服务与办证质量，持续提升群众对公证法律服务的满意度，同时要大力开拓创新业务，加强与有关部门的交流合作，促进公证行业高质量发展。

虹口公证处推出“公证晚班车”服务再升级三举措

虹口公证处积极贯彻司法部“公证规范优质”行动部署，自4月起，通过服务时间再延长、服务效能再提速、服务温度再深化三大举措，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切实落实司法部“四优化四提升”工作要求，构建高效、优质的公证服务体系。

服务时间再提升：将原有每周三天的“公证晚班车”服务，升级为周一至周五全覆盖，并为企业客户开通“错峰办证”绿色通道，集中受理批量业务，解决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无处办”难题。

服务效能再提升：公证处线上办证平台涵盖11大类113个公证事项，其中13项为“公证智慧好办”高频事项。申请人通过公证处微信小程序、“随申办APP虹口公证智慧好办”提交申请，按需勾选“电子公证书”“邮寄送达”，即可“一次都不跑”。

服务温度再提升：新增驻区政务服务中心专窗，连同原有专窗，为企业、群众提供就近公证服务，推动公证服务向居民密集区延伸。

青浦公证处多向发力推动 “公证规范优质”行动 见行见效

青浦公证处深入贯彻司法部“公证规范优质”行动要求，通过处所联动、跨部门协同、智慧服务等多元路径延伸服务触角，将规范优质要求转化为回应民生需求、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区域发展的实践成果。

织密基层法治服务网络，构建处所联动新模式。创新打造“公证处+司法所”立体化服务网络，依托双方职能优势将公证服务延伸至群众“家门口”，形成“基础+定制”双轨服务。目前已在练塘、金泽、盈浦等司法所配备专职联络员，实现法治资源精准投放至基层治理。

跨前服务，协同破解宅基地户籍迁移难题。针对宅基地确权衍生的户籍迁移需求激增的现状，青浦公证处主动跨前一步，联合青浦公安分局开展宅基地户籍迁移公证，成功办理宅基地户籍迁移公证70余件，推动公证服务质效与群众满意度双提升。

智慧公证，赋能西岑国际人才港建设。围绕西岑国际人才港建设需求，青浦公证处对接长三角“一网通办”虚拟窗口，公证申请人只需通过长三角“一网通办”虚拟窗口发起“上海市青浦区司法分中心——公证咨询”业务申请，系统会自动匹配办证系统专线服务人员，通过视频连线，实现“一次都不跑”公证服务。

卢湾公证处党支部参观纪念五卅运动100周年文物史料专题展

4月27日，卢湾公证处党支部组织支部成员与建六居民区党总支联动共建，一同参观“热的血”——纪念五卅运动100周年文物史料专题展，缅怀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聆听时代召唤，汲取奋进力量。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党员们通过五大内容板块，逐步厘清历史脉络，透过百余件实物展品，回顾那段峥嵘岁月。

嘉定公证处赴上海政法学院开展主题讲座

4月28日，应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邀请，嘉定公证处公证员李亚萍在该校开展“一纸公证文书背后的故事——以公证员办证为视角”主题讲座。

李亚萍以现场监督公证案例切入，揭秘公证员在抽奖公证中对数据录入、程序测试等环节的严谨监督，打破同学们对公证工作的刻板印象。同时，她结合高校学子深造需求，讲解无犯罪记录公证、出生公证等涉外公证注意事项，并通过



遗嘱、继承等生动案例阐释法律知识，以故事讲述、现场咨询、情景模拟等沉浸式互动，为学生带来职业认知课。

临港公证处参加临港新片区法律服务机构调研座谈会

5月12日，市委常委、临港新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金山主持召开临港新片区6家代表性法律服务机构调研座谈会，详细了解法律服务机构发展情况，回应发展诉求，倾听发展建议。临港公证处党支部书记、主任丁闻在座谈会上就公证护航知识产权保护、助力“企业出海”等方面作交流发言。

陈金山强调，一是要更加着力于服务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法律服务机构在临港拓展更多新业务；二是要着力于加快开展国际合作，法律服务机构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三是要围绕新片区重点产业，打造更专业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尤其是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加强特色化的知识产权保护。

临港新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专职副主任赵义怀，管委会相关处室负责人参加调研。

市司法局赴东方公证处开展专项调研

5月12日，上海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卢正一行赴上海市东方公证处调研，实地察看了东方公证处接待大厅、办证接待室及公证发展陈列室等，与窗口接待公证员交流，了解窗口工作情况，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

卢正对东方公证处在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保障民生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三个方面要求。一要坚持政治引领，打造专业化队伍。要着力搭建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培养平台，加强公证员多元化技能培养，强化政治能力，提升业务素能，增强公证员队伍专业性和影响力。二要激发创新活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要围绕服务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培育拓展新型公证业务；要持续深挖专精业务领域，进一步把特色业务做大做强、做深做透，努力提供专业法律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质量监管，提升公证服务质效。要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贯彻落实司法部“公证规范优质”行动部署要求，践行服务为民宗旨，提升公证服务质量和公信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宝山公证处携手街镇园区开展系列普法宣传活动

5月是《民法典》施行以来的第五个“民法典宣传月”，宝山公证处积极组织公证人员深入基层，参与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普法宣传活动，将民法典知识与公证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5月13日，宝山公证处积极参与张庙街道“与民同行，法治相伴”民法典宣传主题活动，围绕群众关心的婚姻家庭、财产继承、遗嘱公证等热点，结合民法典条款为群众“一对一”答疑，用通俗语言讲解公证流程，助力民法典精神融入社区生活。

5月15日，公证员侯瑞走进环上大科技园零号基地，举办“发挥公证职能，优化区域营商环境”专题讲座。现场分享为企业服务优秀案例，围绕企业运营、知识产权保护、对外贸易等场景，阐释公证在维权、交易中的保障作用。还介绍宝山公证处推出的“四双一”“一站式”服务以及线上专窗服务等便企举措。

同日，罗店镇四方村开展“公证知识进乡村·法治温暖老人心”活动。公证员章雯莉聚焦老年人权益，以“以案说法”形式讲解遗嘱形式、继承顺序、居住权等法律要点，强调遗嘱公证在明确财产归属、避免家庭纠纷方面的重要性，并详细介绍办理遗嘱公证的流程及注意事项。

市司法局赴张江公证处开展专项调研

5月16日上午，上海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卢正一行赴张江公证处调研，了解张江公证处接待大厅和窗口工作情况，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

卢正对张江公证处在业务发展创新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二点要求。一是强化规范意识，严守执业底线。公证机构承担着独特的监督职能，要更严格规范业务流程，要时刻坚守执业底线，这是公证行业安身立命的根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维护公证行业的公信力，为当事人提供公正、高效的公证服

务。二是积极探索创新，发挥示范作用。当前，公证行业发展面临较大压力，张江公证处作为合作制公证机构，更应积极主动作为，多出经验、多积累案例，为新兴领域公证行业标准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撑，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协会青年公证员委员会举办“青”听“青”诉系列活动

5月23日，市公证协会青年公证员工作委员会顺利举办“青”听“青”诉——青年公证员成长记系列活动第三期“法律研习篇”。活动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实务应用展开深度研讨。市司法局公证工作管理处一级调研员陈继军，市公证协会副会长张磊、监事忻凌娜、业务规则和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贤春、培训委员会委员朱沛冉出席活动，青年公证员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霓雯主持活动，副主任委员刘敏、蒋佳春参加活动。

张磊在致辞中指出，司法解释的更新既是执业规范的“校准仪”，更是业务创新的“方向标”，他寄语青年公证员以专业态度深耕业务，回应群众多元化需求，在识变、应变、求变中推动公证事业创新发展。

普陀公证处举办意定监护法律知识与《软法指引》推广公益讲座

5月29日，普陀公证处联合长寿路街道司法所举办“未雨绸缪，守护未来——意定监护法律知识与



《软法指引》推广”公益讲座，获居民广泛好评。

讲座紧密围绕长寿路街道老年居民的现实需求展开。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辰阳聚焦《民法典》意定监护制度，深入剖析了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为何“意定监护”不可或缺。结合社区高龄、独居、失能老人可能面临的困境，阐释意定监护在确保医疗意愿被尊重、财产得到妥善管理、避免监护权争夺纠纷、维护晚年生活自主与尊严方面的核心价值。其次，如何用好这把“法律保护伞”。李辰阳从监护人选择标准、职责范围、监督机制、设立的法律要件等方面一一进行展开，以深入浅出的语言获得现场居民朋友们的点头认可。

上海首家“涉外财富传承公证服务中心”成立

5月29日，徐汇区涉外法律服务“全球1小时响应计划”发布会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班结业式在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模速空间”举行。会上，徐汇公证处作为“MTCC 徐汇协议”成员方，积极响应涉外法律服务“全球1小

时响应计划”和“公证规范优质”行动，成立上海首家“涉外财富传承公证服务中心”，并发布上海首份《涉外财富传承公证服务指引》，响应“公证规范优质”行动与涉外法律服务创新需求。上海市司法局公证工作管理处处长徐文生，徐汇区委依法治区办副主任、区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左静鸣为“涉外财富传承公证服务中心”揭牌。

松江公证处 喜迎“六一”传爱心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松江公证处到共建单位新桥镇的民工子弟学校陈春小学进行走访慰问。公证员们满载着对孩子们的关爱，将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带到学校。

学校的领导对松江公证处长期以来的支持与关心表达了衷心感谢，并表示不会辜负为上海这座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建设者的期待，保证教育质量，努力为他们的下一代打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新虹桥公证处党支部与建纬所党总支开展结对共建活动

6月6日，新虹桥公证处党支部与建纬律师事务所党总支联合开展“贯彻八项规定，弘扬优良作风”主题党日活动。双方以党建共建为纽带，探索法律服务领域协同发展新路径。

新虹桥公证处党支部书记、主任徐雪梅与建纬律师事务所党总支书记、主任邵万权分别介绍单位及党组织建设情况。双方签订共建协议，标志着合作关系正式开启，双方将在未来的党建及业



务工作中合作互促，共同探索法律服务领域协同发展新路径，为司法行政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2025年度“证·言”系列沙龙 首期活动顺利举办

6月10日，由上海市公证协会培训委员会、业务规则和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25年度“证·言”系列主题沙龙第一期活动成功举办。本期沙龙以“规范办证实务交流与典型案例解析”为核心议题，希望通过交流如何面对争议复查，从而回溯公证办理流程，进而提高公证员风险防范意识、规范办证细节、稳定公证质量，为公证机构内部建章立制的完善提供依据。活动吸引了本市各公证机构众多资深公证员踊跃参与。



（来源：各公证处）

行业掠影



◀ 5月23日，市公证协会青年公证员工作委员会顺利举办“青”听“青”诉——青年公证员成长记系列活动第三期“法律研习篇”。

▼ 3月底，普陀公证处主任高剑虹赴社区开展“法进基层，安享晚年”意定监护宣讲活动。



▲ 4月27日，卢湾公证处党支部组织参观纪念五卅运动100周年文物史料专题展。



▲ 4月29日，嘉定公证处公证员陆海茵赴社区开展公证法律宣讲。



▲ 5月28日，新虹桥公证处参与世博地区首届职工品质生活节暨央企总部基地幸福集市，为职工们提供公证咨询。

会 员 天 地



《姹紫嫣红》（方旭华）